

2011 年冬季号【总第 8 期】

2011.12 出刊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术讲堂

科研能力的提升与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
——走近三大名刊主编 P01

国关人物

罗伯特·吉尔平 P39

聚焦

南开国际关系论坛 2011 P48

2011 年终特辑

2011 国际时事年终盘点 P72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知识体系 (2001-2010) ... P86

愿同学们把这份
对国关的热情保持
下去。
张若冰
09年10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2011 年冬季号

【总第 8 期】

2011.12 出刊

*****About us*****

主编：李金潼

本期执行主编：董柞壮

副主编：孙迪 龚秀娟 姜忆楠 吕海

编辑部成员：陈冲 邓子立 袁婷

田光强 徐芳宇 任娟 李文婷 江育恒

权贤美 王芳琳 曹滢 张晓康 郝丽君

校对：董柞壮 姜忆楠 孙迪 邓子立 袁婷

封面设计：龚秀娟 美编：徐芳宇

*****Contact us*****

E-mail: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Website: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Blog: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
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鸣谢：诚挚感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大力支持。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跨进 2012 年,《新视界》就快三岁了。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用好奇的眼睛观察、用稚嫩的双手触摸、用蹒跚的双脚丈量、用懵懂的大脑思考这个变化万端的世界。您听到了我初啼,看到了我学步,您的鼓励给了我前行的勇气,而您持续的关注和支持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新视界》将永怀感恩之心服务南开学子,服务中国国关的未来。

站在新年的门槛,回望渐去的 2011,我们感慨万端。只一句“你懂的”,相视之间是理解,是知己。2011 年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太多的素材,将长久被人们所关注、所讨论:中东几乎翻了个“底朝天”,海豹突击队送走了拉登,普京在抗议声中“卷土重来”,朝鲜泪别金将军……我们亟待分享您的睿智和洞见;2011 年南开国关为国关学术交流提供了高水平的舞台——国际关系论坛、博士生论坛等学术盛会先后在南开举办。名宿新秀竞相登台,我们着实享受了一场场学术盛宴;2011 年《新视界》编辑部经历了“新老交替”。每年七月一批“老人”从八里台走向大江南北,九月一批新人又从四面八方步入南开园。虽然心中有种种不舍,但这是规律,避无可避。我们接过这本薄薄的刊物,同时也接过了沉甸甸的责任。

展望 2012 年,惶恐之情自不待言,国际形势跌宕起伏恐非你我所能料想。五十八国领导人换届,其中包括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最吸引眼球的或许要数普京“重登大位”,“麦克福尔眼中的俄罗斯”会给你不一样的启发。2011 年山姆大叔离开了伊拉克,文官政府能否 hold 住场面,你我都拭目以待。中东动荡是否止于叙利亚,美国将如何应付桀骜不驯的伊朗,似乎都充满变数。最后,我们忧虑的目光将停留在主少国疑的朝鲜和风云际会的南海。也许,我们能想到的总是有限和平庸的,造物主会呈现另一番 2012 的景象。

行在岁末,眺望未知,我们因为同一个理由充满信心却又忐忑不安:我们要把《新视界》办得更好!我们深知,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要继续精诚团结、锐意进取,对懒散习气零容忍;我们要不断探索创新、毅然前行,对办刊宗旨真落实。我们虽然步子不大,但是步伐坚定。

来吧 2012,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新视界

(季刊)

2011 年冬季号 (总第 8 期)

目 录

编者的话 (I)

学术讲堂

科研能力的提升与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

——走近三大名刊主编 (1)

学术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决策过程中的失误

——小集团思维理论的视角 宋晓丽 (16)

书山有路

未完成的革命

——麦克福尔眼中的俄罗斯 孙 超 (27)

国关人物

罗伯特·吉尔平 权贤美 王芳琳 石宇 (39)

他山之石

主题法与问题法 弗雷德·埃德林 (43)

聚 焦

“南开国际关系论坛 2011” (48)

NEW VISION

(Quarterly)

Winter 2011 (Volume 2 Issue 4)

目 录

2011 年终特辑

- 2011 国际时事年终盘点..... (72)
-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知识体系 (2001-2010) (85)
- 《新视界》稿件转投发表统计..... (90)

新书架 (四) 田光强 董柞壮 (91)

院系活动

- 学术交流..... (94)
- 师生活动..... (97)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101)

学界动态

-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博士生论坛..... (104)

读编往来 (106)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108)

征稿启事 (113)



科研能力的提升与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

——走近三大名刊主编

【编者按】学术期刊是展示学者学术成果最主要的平台之一，而对广大师生来说，期刊选稿、评审等内部运作方式似乎充满神秘。应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邀请，范勇鹏、林利民、陈志瑞三位名刊主编莅临南开，做客“走近中国名刊”系列讲座；讲述他们收稿、选稿、审稿的切身感受，与南开师生分享他们对于如何提升科研能力、创作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体悟与理解。本期学术讲堂栏目邀您一起走近三大名刊主编，感受名刊背后的“学术之美”。

主讲：范勇鹏 林利民 陈志瑞

时间：2011年11月12日

地点：范孙楼116会议室

主办：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承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主讲人简介：范勇鹏，《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法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学和欧洲政治研究；林利民，《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主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兼职导师；陈志瑞，《外交评论》执行主编，曾任《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等主编。

范勇鹏主编：

首先感谢南开大学和吴志成教授的邀请，这个活动十分有意义。我今天主要想讲三个方面：第一，期刊的定位和历史发展现状；第二，介绍我们工作中总结的方式和论文写作与投稿相关的一些技术层面问题；第三，介绍期刊未来主要的发稿方向。

我个人认为期刊和学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在美国有句话叫 **publish or perish**，要作学者，就得发表论文。教育体系规定要发表文章，不论这合理与否，但必须承认发表论文仍然是展示学者科研成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反过来说，期刊对学术界也起着有机的展示和引领作用，离不开学术界的支撑。假如，期刊非常想做某方面的研究选题，但如果在学术圈内没有人做相关研究，那么我们编辑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也就印证了期刊与学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直属单位，前身是1954年创立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当时毛泽东主席认为应该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段研究，并共同创建一本杂志，就是《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主席亲笔题词。这本刊物自

* 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权贤美、李金潼、孙迪、任娟、吕海和曹滢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成稿。在此特别感谢范勇鹏、林利民、陈志瑞三位主编在百忙中对本文作最后审校，并同意授权本刊独家发布。对本次讲座的主办方一并致谢。



成立以来就在中国史学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是史学界最重要的刊物。改革开放后，在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指示下，在这个刊物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创办成立了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此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创刊，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的中文版也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是双月刊，2000年元旦后改为月刊，其英文版稿件主要来源包括三类：中文版文章择优翻译压缩，在其他刊物已经发表的优秀文章作为专题翻译发表，直接用英文写的英文原创稿件。这是中国人创办的英文刊物中最好的一家，也是少数能在国际上盈利的刊物。2000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等陆续创办。2009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后改为周三刊，从而形成了“一报六刊”的格局。“一报六刊”这个格局的好处在于“长枪短炮”齐全，我们有每周两期的报纸，每个月一期的文摘，两个月一期的刊物，每季度一期的刊物，包括中文刊、英文刊、学术刊、文摘刊，包含内容



既有短平快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的报纸，又有高层次的期刊，还有文摘、英文刊等，有利于形成一个多层次、有纵深的学术发表平台。而《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是内部刊物，属于内参性质，创刊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有过批示，涉及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比较敏感、不宜公开的文章或调研报告可以在此发表。

最后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我们欢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踊跃投稿。

我们的机构设置在改革后是按照专业划分的，分为马克思主义部，哲社部，文学部，史学部，国际部，实行一报六刊按专业的“打通”，为根据专业投稿提供便利。

下面介绍一下具体的投稿择稿流程。

第一，关于我们的投稿方式，主要包括直接发邮件或寄纸质版，或通过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投稿系统来投稿。

第二，关于选稿流程，其实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同时也是一个“黑箱”，但是我认为告知是有益的。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在接到稿件后，编辑进行分稿初选，有些被退稿有些进入初审，通过初审后我们再开会讨论，开会通过后进入外审程序。外审主要有两个，是双盲的，即外审和作者彼此不知道对方身份，如果外审的意见是两个全部通过就进入第一，关于我们的投稿方式，主要包括直接发邮件或寄纸质版，或通过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投稿系统来投稿。

第二，关于选稿流程，其实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同时也是一个“黑箱”，但是我认为告知是有益的。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在接到稿件后，编辑进行分稿初选，有些被退稿，有些进入初审，通过初审后我们再开会讨论，开会通过后进入外审程序。外审主要有



两个,是双盲的,即外审和作者彼此不知道对方身份,如果外审的意见是两个全部通过就进入下一个流程,精加工准备发稿;如果外审意见都是不通过,那么两个外审占两票,编辑只占一票,退稿;如果是一个通过另一个不通过,则需要进入反复而复杂的流程。

对最终得到认可的稿件来说,下一个流程是发稿会。我们的发稿会比较特别,五个专业部的编辑在一起讨论,文章要经过所有编辑的解剖和争论。这个环节对于国际关系是不利的,也是最近几年国际关系领域文章发表不太理想的重要原因,例如一篇国际关系的文章,哲学部编辑可能会觉得文章使用的哲学方法没有达到要求的高度;史学部的编辑可能会觉得文章使用的文献经不住推敲;经济学的编辑可能会觉得文章使用的模型不合适等等,在我看来,有的国际关系学科的文章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经过其他编辑的批评建议后,不得已忍痛割爱。

这种方式有利有弊,但是总体上对于提高学术质量是有益的,因此,这就对我们国际关系的文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及到的各部分知识都要非常扎实,让内行挑不出毛病。接下来就是技术性的工作,如印刷、做广告及最后发行等问题,我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从工作方式的角度而言,什么样的文章适合发表而什么样的不适合发,这就涉及投稿技巧和写作技巧的问题。我们编辑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解这些问题可能有利于同学们更有效地投稿。编辑也是人,而且编辑的工作非常繁忙,我个人有时一天就需要看几万字的稿件,沙里淘金,有时在这种疲劳的状态下机械阅稿难免会受到一些技术性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最低发表率达到过千分之二。我感觉,从某种程度上,作者投稿就像高考写作文一样,你的卷面整洁、书法漂亮、格式完整,在同等水平下就更有可能赢得阅卷老师的好感。学术编辑当然有严格的审稿标准。而一篇潦草、不认真、不合规范的文章很难引起编辑的青睐。我经常收到文章,打开邮件一看,有一大堆收件人,而且很多是同仁期刊的朋友,可见这种作者是在没有目的地泛投,是一种“撞大运”,我相信多数编辑会对这种做法很反感。还有的文章投来后,连脚注都没有整理完,或者没有关键词,没有摘要,甚至文字润色都没有完成,这是对编辑的极大不尊重,因为编辑的任务是对一篇完成状态的论文进行审读和编辑,他不是作者的秘书,不负责帮作者整理文字。因此,我建议作者需要了解期刊,投稿须有针对性,比如字数要求、刊例、注释规范、参考文献等技术层面的要求必须达到,转投其他的期刊也要对这些要素进行修改,这也是对期刊的尊重。

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标题是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表达了一个观点,这对于吸引面对浩繁稿件的编辑的注意力来说很重要。有的文章标题经常是“试析”“试论”或采用并列句式(即“XX和XX”这种句式),这样的文章不排除有好文章,但对编辑的吸引力不大。

再比如关键词。关键词是非常重要的检索手段,是为了将来使他人搜索到你的文章,也是让编辑最快掌握你的文章要点非常重要的途径,但不客气地讲,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有些期刊,还不清楚关键词是什么意思,罗列一大堆没有检索意义的词,或者用很长的词组作关键词。打个比方,假设一篇论文是讲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关键词列了“世界 沃勒斯坦 评析”,第一个词太泛,第三个词对文章内容没有检索意义,只有第二个关键词是有效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比方,其实这方面的专门论文都有,这是写论文的基本功夫。



对于编辑来说，了解文章，标题是第一级的路径，关键词是第二级的路径，摘要第三级路径。摘要一般在正式发表时要调整，但是好的摘要在投稿时是非常必要的，写摘要时需注意一些细节，比如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不能带有主观感情色彩，这些如果写“偏”了，编辑会有反感。

在文章开头非常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以“what、why、how、when”等开篇，有一段很明确的方法论和理论说明，阐述作者要用什么理论，为什么要用这个理论，使用什么方法来论证，最后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些看似常识，但仍有大量的作者缺乏这些基本的意识，有时搞得我们很着急。很多已经发表的文章，都没有达到这些基本的标准。有很多文章，前面有很多论证，最后的结论是“喜中有忧，忧中有喜，亦喜亦忧，拭目以待”等说法，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这也是不利于发表的。

最后，投文章时需要调成干净的版式，如果必要，最好给编辑写一封邮件，说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心得，有助于编辑在第一时间抓住文章的亮点。

第三，介绍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稿方向。专业刊物与我们综合刊有很大区别，综合刊的利弊在国际上是有争论的，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多数是专业刊，综合刊很难生存；但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我们的大学学报、研究机构刊物等大多数都是综合刊。综合刊与专业刊



的主要区别在于发稿方向。比如说，《欧洲研究》作为专业刊，涉及欧洲问题，哪怕是就非常具体而微的个案或者一个细节做了一篇宏论，都可能发表。而作为一个认真严肃、希望能够维持自身刊物地位的综合刊来说，刊发文章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体现这个学科比较主流的趋势，至于

细枝末节就只好忍痛割爱，因为“拼”细节我们无法与专业刊竞争，例如如果我们刊发经济学的文章，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可能不如《经济学研究》及时和全面。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发这个学科的文章呢？因为我们想发表能反映这个学科宏观的、有引领性的或者综合性的文章。比如我曾收到过一些涉及具体案例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涉及中国和某一国的边境谈判，写得很详实，但因为定位不符而退稿。

那么我们会发表什么类型的文章呢？

第一种类型称为“宏大叙事”。这个词在现在学术界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因为从后现代史学、后现代社会学兴起之后，很多学术研究都在讲，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曾经都已碎片化得无以复加了，所以宏大叙事在很多学术研讨中受到了排斥。但是我们作为综合刊，要维持自己的特色，我们还是要给“宏大叙事”留出一块“自留地”，让这样的文章能



够生存下去。

“宏大叙事”有几个方面的内涵：一要有历史的纵深感，二要有思想的厚重感。比如说我们今年发表的复旦大学徐以骅老师写的一篇有关美国宗教的文章，其中有一个案例，是关于苏丹达尔富尔运动中美国的宗教界怎样影响美国对达尔富尔的外交政策的。单从题目来看，其实不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有点具体，但是徐老师写得非常深刻，他把美国宗教群体、宗教运动、宗教力量怎样介入美国国会，怎样通过媒体来影响美国的决策，怎样去发动泛美的宗教动员，用一种比较有历史感、比较有层次的方式描述出来，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历史纵深感和思想厚重感，这样的文章后来我们就发表了。

前些年我们发过一些像秦亚青老师、阎学通老师等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出发点、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范式或基本方法论进行探讨的文章。此外，我们也并不排斥具体案例研究的文章，只要其中有这“两感”，能够抽象出、升华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

我们刊发的文章大概有几类，其中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面的文章相对来说宏大叙事的色彩更强一些，而对于像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来说，我们也给偏向实证的或比较具体的文章留下了一些空间，但要求这样的文章做得比较扎实。

第二，我们比较鼓励跨学科或者以问题为导向的文章，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发稿的一个重点方向。比如和我们的定位有些偏差的，发掘这些学科里具体事实的文章，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寻找一个问题，如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国家中心主义的解体、未来世界政府的可能性等等，就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现实价值的问题，展开跨学科的探讨。发表这类文章体现了综合刊的优势和特色。

比如我们在某一个具体领域可能不能和《外交评论》比，但我们的特色是能够围绕一个问题把所有不同学科的视角容纳进来。比如陈老师想谈一个话题，请一些研究经济学或文学的学者来探讨可能就不合适，但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特色。

第三，我们正在尝试鼓励新兴学科的政策。像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以前在我们这发表的文章非常少，我们去年出台了一个政策，即每期留一篇文章的篇幅专门给新兴学科，但到目前为止符合发表要求的文章仍然较少。我们会把版面一直留着，继续欢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学者投稿。

最后，我们还尝试着发社会调查报告。对于重大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经济问题，我们鼓励实证研究。但有的时候实证研究转换成抽象的理论可能过程比较漫长，有的学者涉及到学术生涯的问题，如果做了一个实证研究，多年后才能提炼出一个好的理论，那时再给《中国社会科学》投稿，评职称等现实问题就过去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些对现实时效性的反映，我们辟了一个栏目叫“社会调查”，鼓励学者做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获得比较好的数据，得出比较好的调查结论。

这些是宏观地讲我们的发稿方向。具体到国际关系而言，我想再简单提一下。

第一是回到马克思。现在学术界说马克思的人很多，用的人却少，但是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思维方法还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可能焕发了



一些新的生机；第二是回到中世纪。现在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的，它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发生在中世纪的一系列辩论，发展到霍布斯、洛克、卢梭这些人才最终奠定下来。那么如果我们取法其中，肯定得乎其下，取法其上才能得乎其中。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欧洲思想的根源，然后才能和西方学者去真正辩论这些政治学的话题；第三就是回到公元前。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文明都有一个“轴心时代”，那是人类的幼年时期，那时的很多思想就涉及了人类恒久要面临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因时而变的，但这些问题永远存在。我们从这些问题里面总能发现新的价值。然而，这样说也不是鼓励大家都一头扎进先秦“国际关系”或者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四是回到现实，关注中国和世界活生生的现实，即中国的体制改革，中国与世界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当今民族国家面临的困境，货币政治面临的困境，未来世界的可能等这些现实问题，这些可能会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

林利民主编：

感谢南开，感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感谢吴老师，也感谢各位同学参加这个讲座。

很多人都关心自己的事业，所以我经常在我们编辑部讲一句话就是，每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如果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比如我办好这个杂志，编辑好一篇文章，也是十分有成就感的。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现代国际关系》在专业期刊里的位置。南京有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排名，应该还是比较权威的，我们在政治学期刊里排第五，这对我们这种杂志来说应该是评价很高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政策性的刊物，不是研究理论问题的；在北大的核心期刊评价里我们位列第二；最近五年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量，我们三年第一，一年第二，去年第三。这些是国内的评价，而在国际上，各国驻华使馆都订购我们的杂志，因为我们的杂志刊登动态性、政策性的研究。现在大家对我们的评价很高，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只能做得更好，不能退步。

每个杂志有自身的定位，接下来说说我们杂志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的定位是综合性的，那么我们杂志的定位首先是关注现实问题，且是动态问题，最新发生的。如何理解“现实问题”呢？如果借用英语时态来解释，就是现在时、进行时、现在完成时、完成进行时、将来时，都需要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动态性。举个例子，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的文章，不止北京，上海等地的很多学者都对此有关注。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看法比较消极，因为希拉里通过这篇文章宣誓一是“重返亚洲”，二是要在亚太加强联盟以遏制中国。但当我读到这篇文章后，个人感觉文章中积极的因素多于消极的因素，它是对“利益攸关方”“G2论”的新发展。对希拉里文章的解读，仁者见仁，但解读的结果必然影响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认识。这该如何解读？如果这时有一个学者写一篇解读希拉里文章的文章，如果能说得到位，自圆其说，不管他对该文章持否定态度还是肯定态度，我都会刊登出来。这

就是动态性、前瞻性。

它不仅体现了动态性、前沿性，而且分析有深度。这篇文章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在完成进行时。如果是完成进行时，不仅正在发生，而且还把过去的状态延续到现在，那么我们研究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不排除历史阶段。研究动态现实问题需要跟历史材料结合起来，用



历史材料来支撑观点，解释现实问题。而希拉里这篇文章，它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宣示，是在对中国喊话。在我们认识这篇文章的时候，如果你懂中美关系史，那么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拉里这篇文章是战后以来美国第三个有关亚洲政策宣示的最重要的文章。前两个分别是 1950 年艾奇逊在美国全国

新闻俱乐部的讲话和 1969 年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艾奇逊的讲话是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的，其中讲到亚洲民族主义正在兴起，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要与这股民族主义潮流对抗；蒋介石的失败是由于他自身的腐败，而不是美国的援助不够，所以美国不能够再援助蒋介石了。他的中心意思是向中国喊话，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喊话给予毛泽东压力，希望中苏不要结盟，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准备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而 1969 年尼克松的“关岛讲话”也是有关亚洲政策的，也是对中国的喊话。尼克松在“关岛讲话”里提到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而当时美国和中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他这个时候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呼，就是对中国示好，当然也还有顾忌。

如果这个时候你把自艾奇逊以来美国有关亚洲政策三次宣示的逻辑关系罗列出来的话，文章的第一部分就立起来了。所以说研究现状在应用历史材料时要用完成进行时，不光是进行时，五百年、一千年的事情都可以写，但要用来解释、说明现实问题，谈它对现实的影响。所以我们研究现实问题并不是说不研究历史，而是要用观点带材料、用现实问题激活历史材料。

再比如说最近，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表一个报告，是有关中美冲突的。它是讲关于中美以后发生冲突的引爆点，主要提到了台湾、南海、朝鲜、网络、太空等几个因素。然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家美国智库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它不是直接讲中美冲突，而是讲中国今后面临的战争危机点，它提到的也是台湾、南海、中印、中日等因素。为什么这些重要的西方媒体报纸以及智库会突然开始研究中国和中美之间的战争引爆点呢？懂得美国决策机制的人马上会想到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它的学者、智库与官员、决策者之间相互对流非常厉害。就是说，这些智库、重要媒体、学者的文章很可能是美国政府与其战略界现在正在研究的问题。我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我是绝对相信和平与发展的，但是我突然意识



到美国人现在研究这个（指战争可能性）问题，再加上米尔斯海默最近在日本和韩国非常活跃，将这些现象串联在一起，就回答了前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现在大家都谈中美共治的时候，美国人却在考虑中美战争问题，那说明形势是很严峻的。在发展面前我们很可能需要加一根弦。现在中国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美国在经济上已经无法左右中国了。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要不做一个忠厚的长者允许中国发展，要不就阻碍中国发展。所以此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分析现状是非常合适的。

以上是第一点，有关我们杂志的现实性、动态性。

第二点是前瞻性。第一点里也包括前瞻性。比如说，我们分析 2011 年的国际形势，那么，仅仅分析 2011 年的国际形势是不够的，分析 2011 年的形势，是为了说明 2012 年的国际形势、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国际形势会出现怎样的新趋势，这个前瞻性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在分析 2011 年的形势时，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应该为分析 2012 年做准备。

第三点是战略性。国际战略问题，安全问题，外交问题，中外关系，大国关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等，都是战略性问题。

第四是政策性。为什么西方及美国搞国际问题研究的，包括其战略界这么关心我们的杂志呢？因为它可以通过我们杂志上的文章来了解我们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想法。现在跟一战和二战的时候不一样了。在一战和二战时期，基本上是通过间谍来了解对方的秘密。如果间谍能把对方总参谋部的材料窃取过来的话，自身马上就会有战略优势。但是现在呢，没有战略计划，也无法窃取。因为现在的战争，可能不是事先做好准备的。比如说美国要打利比亚、要打阿富汗，很可能是奥巴马的突然决定，它是灵机一动的，根本无法事先窃取对方的战争计划。大家通过相互研究对方公开刊物和公开媒体了解对方。他们了解中国人有关国际问题的看法，比较注意《现代国际关系》。

2010 年我们杂志刊登了一篇东北吉林大学的学者写的关于韩国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个学者作为访问学者，在韩国待了很多年，他的这篇文章用了大量的韩国资料，立场也很客观。但是我们杂志刊登完这篇文章以后，韩国大使馆就跟该学者联系说韩国公使希望能够与我们见面。后来，他们约在我们杂志社见面，提出不少不同意见，我们对韩国使馆给予我们杂志的关注表示感谢，并表明作者的这篇文章并不代表我们杂志社的观点。这说明我们杂志在国际上是受关注的。

接下来是理论性。大家都知道《环球时报》常常谈及一些现实问题，很少涉及理论，所以大家读起来可能通俗易懂。说实话，我基本上也是不懂理论的。但是如果提到理论，就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那就错了。理论其实是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对复杂的事务进行的最简单的归纳、分析、综合，然后得出一个可以应用来解读具体问题的逻辑、公式。换句话说，理论没有那么神秘，理论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简约，而不是复杂。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理论的要旨。所以，毛泽东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理论。又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对中国革命起到理论指导作用，所以理论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好。

第二,理论必须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理论如果不能解释实际问题的话,那就是理论出了问题,而不是现实“出了问题”。比如说“囚徒理论”等理论,都是要用来解释现实问题的。我们很多同学用这些理论解释现实问题也解释得很好。再比如建构主义理论,应该有人读过相关书目,我不知道大家读得怎么样,说实话我读起来十分痛苦。金庸的小说我一天能读五六本,但是建构主义的理论我一个月也就能读五六页。但是建构主义的书,你越读越薄,最后只需记住“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政策”。这就是理论。

用理论解释现实问题,这就是我们杂志的特点。我把建构主义简化成这么几个字,可以用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为什么美国坚决要消灭朝鲜的核武器、伊朗的核武器,却对印度的核武器采取宽容的态度呢?这就要用“身份”来解释:美国把伊朗当敌人,把朝鲜当敌人,把印度当朋友。身份的建构决定利益,所以伊朗的核开发、朝鲜的核开发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印度的核开发基本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后,利益决定政策,所以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采取坚决封杀的政策,而对印度网开一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时,理论就用上了,就这么简单。所以首先你要懂理论,把理论简化成公式,比如“造反有理”这样的公式,然后用来解释问题。在写文章的时候,你不需要证明“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政策”这一理论的来源或者理论是否成立,那是理论家的事情,我们杂志不需要这样的文章。

综上,我这个杂志的文章是用理论去解释问题,而非用问题去证明某一理论,但前提是理论必须是正确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就是正确的,不能解决的就是不对的。所以理论和政策是结合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有理论创新的,这个理论性表现在:

一是要运用理论,运用理论的过程其实很简单,你不要把它搞得太复杂。

第二,要有理论创新,例如,现在中美关系,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美国这个老大对中国这个老二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允许中国超过他还是努力把中国“搞下去”?米尔斯海默的意思就是把中国搞下去,很多人因为这个问题寝食难安。美国到底会对中国采取怎样的政策?美国是否允许中国成为老大?其实有很多解释方式,也包括理论性的。如果我写文章的话,就会举马拉松长跑这个例子。马拉松长跑,最后一圈时,第一名和第二名只差几步,跑在前面的往往是气喘吁吁,跑在后面的往往是最聪明的,他始终在第一名后面,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冲刺。此时,第一名对第二名有四种方法。第一种是咬着牙,拼命把这个冠军拿到手。第二种情况是实在跑不动,看到第二名超过去,就干脆做第二名。第三种情况是事先跟第三、第四、第五名说好:“可能我后面跑不动了,你们想办法把这个第二名拦住。”第四种干脆就是要赖,让他





受伤，然后自己夺冠。马拉松有四种方式，美国对中国政策相应的也有四种。第一种就是美国人公开讲的，如果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美国乐意看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第二种，就是奥巴马讲的，美国要搞出口倍增计划、振兴制造业，就是说努力不让你超过，跟你公平竞赛。第三种就是我们看到的希拉里的动作，跟韩国、日本、印度、越南、东南亚、澳大利亚结盟，要防范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第四种就是不乐意中国崛起，竭力搞掉中国崛起的势头，如米尔斯海默主张的那样，对中国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要理论，就用这个马拉松赛跑“理论”解读中美关系就行。如果你是名家，在名刊上发表，被别人引用多了，最后你就创造了一个理论：“马拉松夺冠理论”。这个“马拉松夺冠”理论比起“囚徒理论”等一点都不逊色。

理论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抄袭出来的，不是把西方的三四流理论翻译或编译过来然后说是理论创新。理论就是这么简单，理论创新也就是这么简单。我和吴老师讨论过理论和问题的关系。现在在我们的高校里做学问有一个很好听的话，就是分析问题首先要有理论框架。第一部分确立理论框架，第二部分阐释问题。这有点像喝牛奶，聪明一点的人是用开水冲奶粉，用勺子搅一搅。有时候你高兴，或者情绪来了，可能会舀一勺奶粉到口里面去。但是我想没有谁喂孩子牛奶时会舀一勺奶粉然后再舀一勺水，都是把奶粉和水混合起来。理论和问题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杂志强调理论和问题是融在一起的。所以理论你最后是看不见的，你看见的是水，是问题。但是现在高校里，奶粉和水普遍是分开喝的，吃一勺奶粉，喝一口水。

把以上综合起来之后，我们这个杂志的前沿性就确立起来了。现实性、前瞻性、动态性、战略性、政策性、理论性，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杂志。

下面转入第三个问题，关于投稿。有人对政策性的文章不屑一顾，认为我们不是理论性的杂志，但政策性文章其实并不好做。有些学者是理论大师，擅长论证理论但无法把理论简化用以解决问题。《现代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相比，《世界经济与政治》偏理论，我们偏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特点是有材料和案例，但它用材料和案例来论证一个理论，我们是用现成的理论，用公式“解题”。我们用公式分析最后得出一个政策性的结论，该怎么处理问题，而不是论证理论合理与否。我们不关心建构理论的合理性问题，我们是要借助理论分析问题，最后得出来中国该怎么办。这是这个杂志的定位。

所以我想让大家明白给我们杂志写文章的话，先要明白我们杂志的定位，不同的杂志有不同的定位，《外交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些同学或者同志花时间写文章，然后一次打印二十份分别发到二十个杂志去，自认为广种薄收，总有一篇能中，但是很可能颗粒无收，为什么？每个杂志有每个杂志的定位，我的杂志登了，他的杂志不一定登，这就是杂志的定位。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大牌学者解释，即使你文章写得再好，我也可能不发，因为定位不同，如果发了那我的杂志定位就扭曲了，没有特点了。所以大家在登文章以前，一定要想好登哪篇杂志，然后把那篇杂志翻一翻，看看那个杂志有什么特点，包括规范性和特定要求。



第二是选题。现在我们在大学里受过训练，容易写比如名称为《东亚共同体与美国对华政策》或者《东亚共同体与美日同盟》这样的文章，这个“与”字是最难掌握的，题目中有了“与”字后文章的重心难以把握，容易重心不稳。还有人喜欢写比如“美国亚太战略东移”，然后加个破折号，“建构主义视角”或者是“现实主义视角”，我们的杂志不太喜欢这样的文章。

第三是问题意识。一篇文章，特别像我们这样的问题研究杂志，一定要有问题意识，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我们读中学、读小学时接受的训练，即一篇文章要有一个中心、一条线。比如说我的一篇文章是讲这个桌子，那么就围绕桌子的形状、桌子的材料、桌子的油漆、桌子旁边坐的人等等来写，你不要讲桌子旁边是椅子，椅子旁边是窗户，窗户外面是走廊，走廊旁边是过道，过道过了是停车场等无关紧要的问题。

第四是同一个视角。我经常讲，写文章时逻辑上可能出现混乱。比如我写窗户外面的一棵树，从这个窗户望出去这个树的树枝、树叶、树干、树皮是怎么样的，而不要从这个窗户看树的树干然后从另一个窗户看看这个树的树皮，如果文章写成这样那你的逻辑就有错误。

第五是理论和问题相结合。我比较强调资料的权威性，我们比较强调第一手资料，比如研究美国的英文资料，研究俄罗斯的俄文资料，研究日本的日文资料，还比较强调的是纸面媒体，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新闻周刊》等，我不太欣赏网上的材料，为什么呢？如果是严肃、可信的学者，那么他用的材料也是可信的，但是现在网上什么消息都有。一些网络文章，根本不负责，今天讲美国有三艘航母在西太平洋演习，过三天发消息说那个消息是假的或者说美国取消了。那么你到底相信哪一种？所以我还是更相信纸面媒体。

最后就是写作规范，我们这几个杂志各有特点，但总的规范是基本一致的。

下个重点是讲关于匿名评审的问题。我们多数文章是通过我们的信箱投稿的，收到稿件后，我会根据文章的选题、现有的研究基础和作者的情况来判断这篇文章有没有编辑前途。如果有编辑前途，我就会将文章分给编辑；否则，文章就不能进入编辑程序。目前，投过来的文稿能够进入编辑程序的大概占一半。进入编辑程序的文章将会由相应的编辑处理。这些编辑有专门的负责领域，比如，有的负责欧洲，有的负责东北亚，有的负责非洲。编辑会首先和文章作者联系并提意见，主要是要作者对文章的选题、角度、布局和引用材料等进行修改、规范，与本刊物的要求保持一致。然后，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对现状和最新情况掌握得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会与现实情况有出入，于是文章大部分要经过作者和编辑之间五六遍的磨合才符合要求。最可悲的是，有的文章在磨合了五六遍之后仍然达不到发表的标准。另一种情况是，有的文章已经在作者和编辑之间磨合了四五遍，而作者却将文章投到其他的刊物去发表了。我们杂志还有一个区域扶持政策。现在杂志的重头是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发出的文章总量占了70%到80%。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研究比较前沿，而且信息获得也更方便。对于像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边缘地区，我们杂志采取的是扶持政策。所以来自这些地区的文章经过编辑之后还行，我们就会发表。文章实在不行就只能放弃了。再提到一点，就是我做主编时，不会搞匿名评审。一是因为所有的西方杂志也并不都搞匿名评审；二是因为我



们要发表最新的文章，从文章写出来到最终发表，周期很短，不仅难以及时找到合适的评审专家，而且花的时间过多不利于文章保持新鲜感。简言之，我们搞现状研究的杂志“玩不起时间”。

陈志瑞主编：

感谢南开大学和国际关系系的邀请。

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发表文章是不太难的。因为这个领域里刊物的版面绰绰有余，文章发表的空间很大，同时途径也很多。如果大家认真去写，就不用太担心文章发不出来。

首先简单谈谈国际政治的刊物。从办刊物的角度来说，一个重要的指标或者特征就是专业化。这是国外主流学术刊物主导的办刊方向，而国内很少有这种刊物。国内刊发国际政治类论文的刊物有几大阵营。一是高校学报，它们大多数是综合性的。只要高校中有国际关系学科，那么其学报就会发这一类的文章。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面的期刊方阵，比如《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三是其他研究和教学机构办的刊物，比如北京的《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上海的《国际展望》《国际观察》。这些刊物大体上还是综合性的。

《外交评论》应该算是综合性的，因为它其实仍是外交学院学报，以前刊名就叫这个，现在全名叫《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由于在2004年北大版的核心期刊评定中，《外交学院学报》落榜了，所以学院领导希望有所改观，力图使这个刊物专业化。首先是改刊名。当时学院领导顶住压力，将刊名改为《外交评论》，还请江泽民主席题写了刊名。然后是改版，对内容进行调整，将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国际经济等之外的内容全部割舍，而每年的增刊会发一些其他学科老师的文章。我从2008年加入这个刊物，为了把它办得更具有专业特色，2009年我又做了一次改版。一是形式上的，即杂志的开本改小了，这样杂志在书架上立得起来，方便阅读。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继续朝着专业化的方向走。之前《外交评论》有很多栏目，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外交学、国际经济与国际法、青年论坛等等，现在我们



把它简化了。今年我们干脆不按学科内容和讨论的问题分栏目了，而是按文章的体裁和类型来分，论文、学术评论、学术动态什么的。不过，2009年以来，我们每期都做主题讨论。可能同类刊物中只有我们在坚持这样做。每期的主题一般是当时或本年度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每年第一期我们会



做一个跨年度的主题，叫“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每年的第六期会做一个“中国外交观察”；中间则根据当年度的重大或者热点问题出刊。

拿今年第五期举个例子。这一期的主题是“中南亚的战略考量”，即把中亚和南亚放到一块来说，大体是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讨论。从麦金德的学说一直到现在，可以看到所谓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是有变化的。当中东欧被北约化、欧盟化的今天，中亚和南亚就凸显出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一些新的因素也进来了，比如说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等。拿能源安全来说，中东包括伊朗的石油从哪里输送到中国来？除了海上运输，从陆路就需要通过中亚、南亚。而中亚的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本身油气资源也很丰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就使中南亚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第五期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们国内办刊物都会参考借鉴国际上的知名刊物，如美国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国内的许多机构也都希望能办这样一份刊物。能不能办一份中国的《外交》呢？我们也这么想过，但是现实条件还是不大具备，因为尽管国际政治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有些问题还是具有政策敏感性的，比如说朝鲜问题。再比如说南海问题，也是比较敏感的。讨论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肯定会牵涉到政策层面，就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评论，《外交》可以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而我们不能这么做。所以在研究相关问题时，要注意政策与学术的区隔。我们可以采取“建言”的方式，即不去正面批评，而是建议政府部门怎么去调整改进，提高完善。

另外，我们觉得研究力量还是有限。虽然我们做相关工作的人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写得特别好的，尤其是政策评论类的文章并不多。所以不太可能办一份纯粹的政策评论刊物。我们希望尽可能突出评论的特色，但还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包括前面的主题讨论也是如此。主题讨论和非主题讨论之间大体有个比例。主题讨论大概是五分之二，非主题讨论占五分之三，但大都是论文化的，这对组稿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做很多的约稿，尤其是主题讨论，大概每期都会约三五篇。

接下来我想简单说两句对文章的要求。文章的长度一般为12000字到15000字。大概有二十多年，学术文章的尺度都是以8000字为标准。但现在各家刊物发文的长度普遍变长了，原因是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多了，首先需要提出问题，然后做文献梳理，要有理论的建构和理论方法的说明等。也就是说，要讲清楚一个学术问题，还是需要12000字这样的篇幅，8000字可能太短了。总的来说，这是好事，说明我们研究的整体水准的确提高了。然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文章没有定式，可长可短，主要取决于你的需要，取决于不同的题材和文体本身。

我们这边还是会做匿名评审，约稿也需要匿名评审，也有约来不合适被拒掉的情况。现在大多数学术刊物都通过匿名评审保证评稿、选稿过程的公正、透明。一个人或编辑部的几位老师所见是有限的，通过匿名评审，让同行专家评议，从不同角度去看一篇文章，确实很有帮助。我可以保证，投到我们这边来的所有稿子都会得到公正的对待，只要是我们最终认



定达到发稿水准的都会陆续发出来。这可能需要等待发稿的周期，拖的时间也许比较长。我们有一个栏目叫做“学术评论”，主要就是发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也可以）的一些有见地的文章，文章可以短一点，观点也允许不那么成熟，可以是对某个问题或者是研究方法的探讨。这样的文章我们也是需要的，每期都尽量选一到两篇来发。这也是鼓励年青学者多投稿多写作。

接着再花点时间来谈谈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我想把这个问题简化，给大家鼓鼓劲儿。

写一篇好文章其实也不难，概括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发现问题；第二，自圆其说；第三是好的文字。

具体展开一下，首先是怎么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典型的文章就只是把问题进行了梳理，好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这个文章就结束了。以前，综述性的稿子都是这样一个写法。但是这实际上没有提出问题，因为你只是把现象说清楚了。而这个地方恰恰就是研究的起点，即你要说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举例来说，由于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北冰洋开始融化，北极航道开始出现，那么北极周边国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一些国家都会有相应的动作。你把相关材料都收集到一块儿，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重视。这叫不叫研究呢？这当然也花了一点工夫，但这不叫研究，只是为研究做了最基础的准备，而下一步提出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比如，为什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才是研究的起点。你从国际法、国家间关系、海洋法等各个方面对它进行论述，就比较有意义。所以，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很重要。

第二点，自圆其说。什么叫自圆其说呢？就是你把理论构建、文献资料、分析工具等综合起来加以运用。条条大道通罗马。我刚刚说到文体的时候也是如此。文章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文体。比方说，哲学家写一篇文章，他可能一个注释也没有，但你不能说他的文章没有价值，就像《论语》，它也就那么多字，但是我们已经学了几千年了。因此自圆其说很关键，总归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言之有物。

第三点，我想讲的是常识的重要性。你若违反常识，会导致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比方说，我坐在这儿说：“今天的天气还不错，挺舒服的。”边上有人就说：“真的是这样么？难道北极的天气也是这样么？难道赤道的天气也是这样么？”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说天气不错很舒服，我肯定是根据当下的情况说的，但从语言这个角度，我确实是不周密的。按常理，没有人会把温度适宜的具体环境说出来。他提出这个质疑本身是违反常识的，因为他不是根据规定的语境、条件去讨论这个问题。有些文章违反常识，提出问题的思路就是不对的。当然也要重视反常识的思考。还拿气候变化举例。为什么泰国会闹水灾？这是它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为什么美国在十一月初的时候会遇到暴雪，它可能以前也没有碰到过。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这种常识以前是没有的，目前这些现象是违反常识的。你就要从违反常识的现象出发去推导出命题，去提出问题，这就可能形成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第四点，我想说一下的就是学会叙事，通俗点说就是“讲故事”。简单而言，就是文章的起承转合，实质上就是文章的逻辑结构和内在机理。一篇文章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故事是否完整。我们知道小说可以靠人物的性格去推动故事的情节。那诗歌有没有故事呢？诗歌其实是靠情绪的跌宕起伏以及前后不同意象之间的关联来生发的，它也是有故事的。更不用说学术论文了。那么，学术论文的故事在哪里呢？就在于逻辑，在于起承转合，在于作者怎么去展开、怎么去发展，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最后一点，我想做研究，写学术文章，也应该讲究一下文字。作为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作，文字不通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不管学问做得多大，如果文章的文字都不通顺，就称不上是优秀甚至是合格的学者。

我还想说两句文章之外的感悟。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对大家有什么用呢？也不见得对大家发表文章有直接的帮助。但我要强调的是，在动笔之前，我们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写文章。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写作动机，比如我们要完成学年论文，我们要完成课题，要评个什么奖，或者我就是有兴趣。我觉得想一下这个事情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写作的定位非常有帮助。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写作是基本的生存技能。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不会去做学术研究，可能会去当老师、公务员、公司职员或媒体从业人员。这些其实和做文字工作的道理是一样的。假如你掌握了写好一篇文章的要素，你给单位写一篇调研报告，大概也是这么回事：端正写作的立场和态度，有问题意识，要说清楚什么问题，用什么来支持它，用什么文字来叙述。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以后就没有问题。

时间所限，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初次审校：权贤美、孙迪、李金潼]

[最后审校：范勇鹏、林利民、陈志瑞]

[责任编辑：李金潼]



未完成的“革命”

——麦克福尔眼中的俄罗斯

孙超*

内容摘要：作为美国中生代斯拉夫研究的典型代表，麦克福尔担负着新一代美国学人理解、分析和诠释俄罗斯全景的任务。麦克福尔在其著作中使用大量一手材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后苏联时代转型期图像，并思考转型理论的可能性，开拓出转型理论之“人”的分析架构，为我们理解更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这位尊崇美国民主价值观、崇尚自由的学者，将俄罗斯自解体后近二十年的发展理解为“未竟的革命”，并通过其转型研究，表达了美国学人对俄罗斯转型的担忧。

关键词：转型；革命；麦克福尔；俄罗斯；民主化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A. McFaul）并不是一开始就关注俄罗斯的“革命”。^①1988年，这位将“革命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年轻学者，期望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多的收获。但是，这场经历被证明“完全失败”，并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②那个时期不仅是他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苏联的变革期，更是国际政治的变幻期。在这个时段，戈尔巴乔夫如火如荼地开展政治改革，东欧国家酝酿革命，美苏之间关系调整。在欧亚社会版图变革的前夜，麦克福尔恰巧接触到了以推翻共产政权为志业的“真正的革命分子”。丰富的经历不仅让麦克福尔认识信奉“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自由论者，也完善了这位西方学者研究“革命”的方法。^③麦克福尔积极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之中，得到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如其所说，“我的许多朋友成为后苏联时代的高级官员，而我也被俄罗斯吸进去了”。苏联解体后，麦克福尔将目光聚焦俄罗斯身上。围绕着俄罗斯的民主化和美国的责任，麦克福尔独立开展研

* 作者简介：孙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邮箱：sunchao_226@163.com。

- ① 事实上，中国学者唐贤兴认为麦克福尔所使用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革命”并不是同一回事，麦克福尔在这里所使用的“革命”并没有过多的价值判断，而集中于“对重大社会的政治变迁的描述”，由于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变革是剧烈的，甚至是暴力的，用革命一词更能够体现出其彻底性。关于这方面的著述可见他的博士论文，Michael McFaul, “*South African Liberation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91, 以及其早期的文献：Michael McFaul, “The Demise of World Revolutionary Process: Soviet-Angol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3, March 1990, pp. 165-189; Michael McFaul, “Russian Centr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Post-Soviet Affairs*, Vol. 9, No. 4, July-September 1993, pp. 196-222;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其使用革命的逻辑正如上述所言，唐贤兴分析见[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序，第2页。
- ② Robert Dreyfuss, “The Rise and McFaul of Obama's Russia Policy,” <http://www.thenation.com/> (date as of May 15 2011)
- ③ 具体内容和有趣介绍见：Meredith Alexander, “Stanford Political Scientist Michael McFaul Takes a Revolutionary-new Look at Russian Politics,” <http://news.stanford.edu/pr/01/mcfaulprofile1128.htm> (date as of May 15 2011)



究。在其著作中，他创造性地使用“革命”话语，在重构美国人心中的俄罗斯的同时，极力宣传民主发展对俄罗斯民族和世界进步的重要性。作为“民主的斗士”，麦克福尔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描述和政策动议要求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民主进步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如何认识从后苏联空间转型这一复杂的政治现象？在麦克福尔看来，这种现象的最好解释就是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革命性过渡”。^①而过渡、转型、革命和民主等关键词是认识后苏联地区复杂变迁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分三个部分考察麦克福尔的思想。第一部分是介绍和分析麦克福尔所运用的主要理论工具；第二部分将运用理论工具，呈现他心中的“俄罗斯”意象；第三部分尝试分析麦克福尔与美国对俄政策的关系。

一、转型：个人·制度·国家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政治和社会实体出现了。俄罗斯“从破到立”所经历巨大的时空变迁不仅给其带来深刻影响，也对研究苏联的学者带来巨大的冲击。苏联的解体给西方的斯拉夫研究带来大量值得研究的课题：苏联为什么会砰然倒塌？俄罗斯又是什么？该如何看待俄罗斯？俄罗斯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的巨大价值以及西方学者解释苏联崩溃的乏力要求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进行观察。

在麦克福尔的眼中，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变迁正是“转型的体现”。俄罗斯的转型是“第四波”浪潮的体现。不同于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麦克福尔认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量苏东国家的体制转型同时带有“民主和独裁”的特点。^②与僵化的、不可见的结构性分析和制度分析不同的是，第四波“转型”则更加强调“人”的因素，并置于首位，而非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和历史制度安排。^③麦克福尔研究指出，最近三十多年里许多研究民主化问题的理论家早已相当注意行为体的作用，特别是精英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并把这些看作是转型过程的关键事件。^④由此麦克福尔开始将更多的目光转向行为体，从权力、偏好与制度设计入手，分析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和创建新制度之间的联系。

（一）个人——转型的中心

麦克福尔将个人的作用和选择置于解释转型的核心。他认为精英斗争的结果决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在旧制度崩溃和新制度未成型的转型期，所有的国家精英都面临着多种选择。面对着不确定性和风险，精英们往往倾向于按照自己所构想出来的意图设计新的国家。由于偏好、权力分配、信息渠道、不确定性以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作用，国家制度总是呈现出他们理想政治设计的次优解。在麦克福尔看来了解国家转型的关键是要了解国家精英态度及偏好，促进或阻碍变革的能力，它们是判断国家转型的方向和结果的前提。

^①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54, January 2002, pp. 212-244.

^③ Ibid., p. 214.

^④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 6.



为了有效解释后共产主义转型国家的精英的作用,麦克福尔抛弃了仅凭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合作型的转型模型”来解释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策略,他认为转型的实现主要是精英之间斗争的结果,因此有效的契约(successful pacts)实现国家的转型的作用很小。为此,麦克福尔区分了两种情况:暴力的非协商性的过渡(non-negotiated transition)和协商性制度变迁(negotiated regime change)。他着重强调了争议性的变迁议程和行为体之间权力平衡在协商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理解俄罗斯转型和政权类型关系的关键。而精英在过渡时期的重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精英创建制度,并使其服务于自我之需。这些制度大多反映了精英们的偏好。(2)制度的诞生受到精英之间的权力分布以及为符合其自身的制度所付出代价的影响。由于精英之间存在妥协,成型的制度在精英看来是次优的结果。(3)国家精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情况,影响体系创建,而且在有限时间内他们对自身的力量和制度的期许是不同的,创造的制度也是“不完全理性”的。可见新制度的产生不是他们“设计出来”的,而是“应对”出来的。(4)国家精英对过去经验的信奉影响着新制度的内容和实质。

从其“角色中心”论可以看出,麦克福尔始终将“精英行为”放在“转型的中心”考虑。转型的核心动力来自“精英的制度设计”。^①麦克福尔在这个逻辑的指导下发展出许多概念,如“制度设计”、“不确定性”、“偏好”、“信息不对称”,它们被用于解释精英们在面对巨大的政治变迁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虽然,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科学家强调“科学的结构和历史”等等结构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一定意义上的“人”的解释。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风险,即仅看到微观群体而忽视了社会整体、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的演变。这种微观化的分析视角与麦克福尔的研究“转型”的经历不无关系,但是也正是这种视角让人们看到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微观进程,对这种转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理解。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麦克福尔虽然强调精英的作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影响国家转型的另一个变量:代际变化(generational change)的重要作用。^②他分析了俄罗斯青年对资本主义、民主、西方的看法,并与其父辈做了比较,认为“可口可乐”一代的青年俄罗斯人更加倾向于支持资本主义和民主,更亲西方,反对车臣战争,反对极权,他们将会对俄罗斯的民主化做出更大的贡献。^③

(二) 制度——转型的方向

关于“第四波浪潮”的转型,麦克福尔强烈反对学者们的“帝国意图”,即把对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的研究归纳入一般性的比较分析之中去。他认为前苏东地区转型可以用“民

^① Michael Mcfaul, "Institutional Design, Uncertainty, and Path Dependency during Transitions: Cases from Russia,"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1999, p.27.

^② Michael Mcfaul, "Generational Change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Washington, D.C.: Heldref Publications, 2003, pp.1-16.

^③ Mcfaul, "Generational Change in Russia," pp.1-16.



主化第四波”来解释。^①但第四波浪潮与第三浪潮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核心不同就是第四波浪潮的方向是不确定的。精英们对新民主还是旧制度的认同权力分布比例影响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旧制度认同的精英占上风，国家倾向于独裁方向；反之则民主化。^②而均势情况存在使得后苏联空间某些国家转型变得非常复杂，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俄罗斯的转型正是如此。

按照麦克福尔的说法，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盛行于国家精英不同的观念和权力分配格局塑造各国的制度。如果权力分配有利于民主化，那么自由民主制度很可能会在这个国家建立；同样，如果权力分配支持独裁，那么威权制度也可能相应建立，两种制度都会非常稳定。^③相比之下，如果理念完全不同的精英的权力均势，那么这个国家在十年之后还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④因此，第四波浪潮并不具有一致的方向——民主化。

显然，这是麦克福尔重大的贡献。他发现了：转型模式影响着（随后）产生的政治体制的类型。^⑤虽然，麦克福尔发现了这个事实，但是他还是非常支持各国民民主化，特别是俄罗斯的民主化。麦克福尔想尽一切办法去发现支持俄罗斯民主的因素，批评俄罗斯的“民主倒退”^⑥，并多次撰文呼吁美国从外部支持俄罗斯实现民主化。^⑦

（三）国家——转型的必要条件

正是区分了转型期和转型后的政治体制类型，整个转型国家的政治分析就可以采用较为科学的方法。这从时间上解决了分析转型国家的困难，但是如何从空间上解决我们对转型国家的认知呢？换句话说，转型期的国家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何考虑转型期国家的主权和其边域？

这也是麦克福尔思考的主题。后共产主义国家虽然政治经济问题较为突出，但也存在着国家和民族的边界问题。如果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解决的是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的话，那么第四波则是全面解决主权问题，即从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和联邦政体转变为民族国家和独立行为体的问题。这是转型本身？还是转型的结果？

正如麦克福尔自己在分析俄罗斯联邦建立时所谈及的：

“……俄罗斯的革命者们被赋予了同时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的机会，当然，还有相应的负担。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厘清国家边界。……即使在1991年12月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签署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治定位、疆域定位和心理定位都还是个未知

①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 7.

②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p. 227.

③ Ibid., p. 226.

④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p. 226.

⑤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39页。

⑥ For example, "The Democrats in Disarra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4, No. 2, April 1993, pp. 17-29; "Is Russian Democracy Doomed? Explaining the Vot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2, April 1994, pp. 4-9;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1, No. 3, July 2000, pp. 19-33.

⑦ For example, Michael Mcfaul, *American Efforts at Promot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Russia: Lessons Learned*, discussion draft, Sep 27th, 2004; "Democracy Promotion as a World Valu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1 pp. 147-163.



数。……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来治理国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必须先确定他们国家的位置在哪里。”^①

上述材料反映出，麦克福尔认为国家在转型中作用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和“建立政治体制的前提”。他认为“确定国家边界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②他表示转型国家的领导人首先应该解决议程上的其他两个问题——重组经济和划清国家边界。^③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议程之一，麦克福尔认为精英们有必要将国家本身政治定位、疆域定位和心理定位确定下来，为体制转型奠定基础。由此可以判断，麦克福尔是将国家作为体制转型的前提以及最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提出来的。当然，当我们把距离拉近，就可以观察到，麦克福尔所要说明的“国家”具有模糊性的特点。一方面，他承认也同意国家的构建是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前提；但是在具体的论证中，特别是关于俄罗斯的体制转型的论证中，他却认为国家构建是制度设计的重要议题之一，作为制度设计最迫切的议程需要加以解决。正如他所说，“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一些多民族国家也不得不在议程中加入第三个议程——民族与国家的边界问题——要么分崩离析，要么在巩固民主政治问题上比那些民族更为单一的国家失败”。^④

事实上这种模糊性其实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他所谈及的确立“国家”问题实质上是在国际意义上获得“主权”的问题。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已经确立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而这一“国家”问题剩下的工作就是谈判确定与他国的边界和利益的问题；第二，他所谈及的作为迫切议题“国家”的问题，其实质是指国内层面，换句话说为了防止民族分裂和分权化倾向要塑造心理认同上的“国家”。这里的“国家”涉及到转型的核心议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结构形式、建立多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等。“国家”意识成为转型的动力。因此，国家不仅是转型的必要支撑点（从国际意义上看），也为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从国内意义上看）。国家无疑成为转型的重要条件。

二、俄罗斯未完成的“革命”：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转型

全球化的今天，变迁无处不在，并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技术变迁、人口变迁、快速的生态变迁以及由经济和政治模式内在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变迁。^⑤与这种社会变迁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剧烈的、动荡的，是国家重新塑造、意识形态重新构建和整个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的历程。

①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135页。

② Dankward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No. 2, April 1970, p. 351; cited from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54, January 2002, p. 216.

③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134-135页。

④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hilip Roeder, "People and States After 1989: The Political Costs of Incomplete National Revolutions," *Slavic Review*, Vol. 58, 1999, pp. 845-882. Cited from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10.

⑤ [美]史蒂文·瓦戈著：《社会变迁》（王晓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麦克福尔经历了、关注了这一过程，他认为这是一种革命，是一种从共产主义统治过渡到民主的“革命”，是一种社会革命，是一种长期转型下的革命。^①

（一）政治革命：共产主义·民主·“独裁”

俄罗斯的转型不仅是长期的而且也充满着冲突与暴力。^② 在其名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中，他用大量篇幅来描述三大转型期：戈尔巴乔夫时代，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和“第二共和国”的时期。^③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旧政体的领导人与新制度的精英们围绕着制度本身展开激烈的斗争，实现协议的主要手段并不是通过谈判而是依靠强力，强迫成为转型的主要模式。值得麦克福尔记住的是三个重要的关节点：1991年的十月事件，1993年的炮轰议会事件以及1999年的普京担任总统。这三个时点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这三个重要节点又是划分麦克福尔所规定的俄罗斯的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重要时间变量。按照麦克福尔的话来说：

对俄罗斯而言，十月事件是一场国家悲剧，……还使俄罗斯不再以浪漫的姿态拥抱民主。十月事件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制造了权力高度不对称的状态，削弱了权力分立的原则。如果1991年的军事对峙的解决标志着民众开始支持新政权以及它所宣称的民主理念的话，那么，1993年的冲突的结束标志着民众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点。当民主政府不再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它会失去社会合法性，转而阻碍民主制度的巩固和深化。^④

第一共和国的失败和结束，麦克福尔开始重新思考“俄罗斯的民主”。自1993年之后，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会不会因为出现挫折而重新回到威权状态，俄罗斯会不会返回到苏联的“独裁政权”？^⑤ 麦克福尔认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⑥ 按照他的逻辑，1991年到1993年俄罗斯第一共和国的政治设计是通过设定议程，推翻计划经济并进行市场化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制度改革并没有放在首位。而随着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全面确立，叶利钦所关注的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转向政治制度设计。通过1993年的事件，叶利钦展示出了相较于其他势力所不能具有的权力并获得了在政治游戏中设置新规则的能力，而正是这一强制性甚至充满暴力的结果使得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获得了“强力”的支持，并开始向“自由民主”的国家迈进。^⑦

①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p.8-11.

② Michael Mcfaul, "Russian Democracy: Still Not a Lost Cau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1, p. 161.

③ 依照麦克福尔的说法，第一共和国是特指俄罗斯从1991年8月八月政变到1993年10月炮轰白宫为止，为第一次民主转型；而第二次共和国是特指从1993年炮轰白宫后以及新宪法的颁布作为第二次的民主转型，以下未加说明，均为特指。

④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227页。

⑤ The idea comes from Vladmier Pastruknov, "Comic-Opera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Megapolis Express*, October 20, 1993;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November 10, 1993; Philip Roder, "Varieties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st-Soviet Affairs* No. 10, 1994; Donald Murray, *A Democracy of Despots*, Boulder; Western Press, 1995, p. 224.

⑥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228页。

⑦ 同上。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或者用麦克福尔的话来说为“过渡的立宪政府”时期,俄罗斯开始逐步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设。从新宪法的设立,到国家内部政治制度的建构,到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再到新执政党的成立,叶利钦不断用其权力平衡中的优势地位强化民主在俄罗斯人心中以及俄罗斯政治制度中的力量,开始自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进行的,第一失败后的再一次(或者说是第三次)民主化努力。^① 这些措施虽然有利于构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但是超级总统制、一个制度化很弱的政党制度、一个组织不力的公民社会、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和进展缓慢的法治,构成了俄罗斯新民主政体的一长串缺陷,俄罗斯的民主缺少自由民主的特性。^② 麦克福尔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缺乏西方天然的自由庇护,缺乏自由的文化或者说是后共产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制度痕迹在俄罗斯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而这种非自由制度反过来也会威胁俄罗斯脆弱的民主制度。

经过第二共和国长期的政治努力,俄罗斯的已经成型的“选举民主制度”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吗?^③ 麦克福尔以此问题结束了对《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的讨论,但事实上“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还远没有结束”。普京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则是麦克福尔所称之的第三个转折点。对叶利钦时期的那种反对其他学者谴责其“否定俄罗斯民主”的论断所不同的是,麦克福尔看出普京将要“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开始”。^④ 这种开始是实质反民主的“可控民主”的开始。他丝毫不掩饰对普京时代民主的倒退和强化中央集权的不满。“不论普京时代人们将获得什么收益,在民主社会中这些收益将会变得更多。”^⑤ 麦克福尔历数普京的种种“反民主措施”,控制媒体自由,减少地方政府的自治,加强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强化政府对政党和 NGO 的控制,以稳定为优先考量标准等。^⑥ 麦克福尔反对将“独裁政治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他同时指出“俄罗斯想做下一个中国,但很可能是下一个安哥拉,那个靠出卖石油发家而不是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大众利益的国家”。^⑦

麦克福尔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同情倾向与对普京的极力反对会让人产生有意思的联想。这位维护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学者典型代表了欧美学者思考俄罗斯政治转型的重要立场。在这位学者的眼中,“自由民主”是最高的价值体系,而且不容分割,“可控民主”,“选举民主”等一切制度设计如果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标准就等于违背了最高的价值体系,应该受到批判和指责。这种明显的价值观倾向影响了麦克福尔对普京的公正评价,也使得其分析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结束了政治经济相对混乱的时期,建立起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也正是在这一秩序下,俄罗斯的民主才能真正的生根发芽。普京的民主虽然被看成是“可控的”(managed),

① Mcfaul, "Russian Democracy," p. 161.

②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356页。

③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④ Masha Lipman and Michael Mcfaul, "Managed Democracy" in Russia, Putin and Pres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Vol. 6, No. 3, 2001, p. 116.

⑤ Michael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Vol. 87, No. 1, p. 70.

⑥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pp. 7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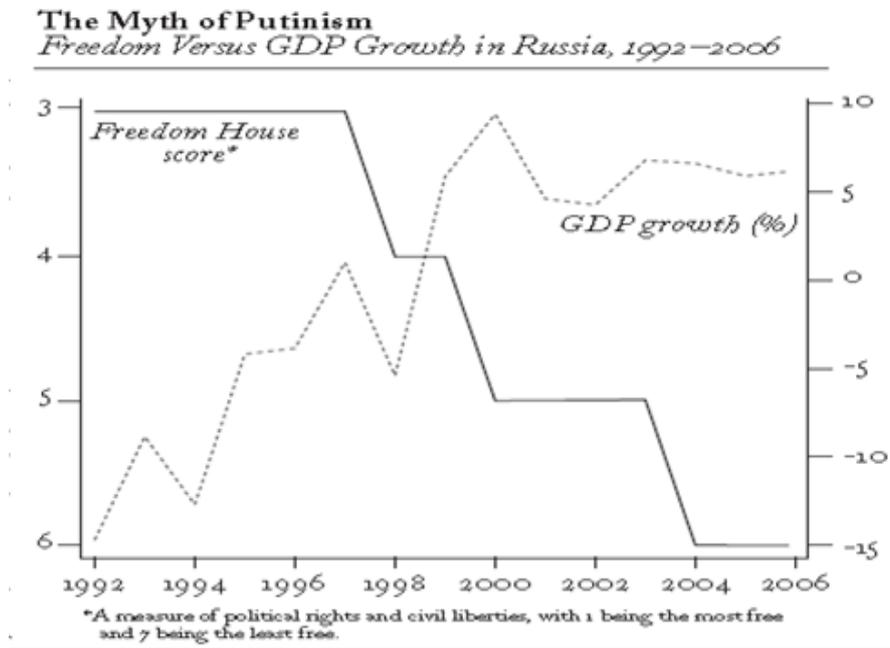
⑦ *Ibid.*, p. 84



但普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民主，其保留了自叶利钦以来的民主遗产。这种强人政治的出现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民主长远发展之需。如果仅仅从一个角度看到普京为实现社会稳定而采取的部分措施就否定普京对俄国政治进程的“民主化”努力的话，那就显然没有看到整体的俄罗斯的“民主气氛”的活跃，没看到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成长和俄罗斯民众对民主政府期望增加等维系和实现民主的关键因素。

(二) 经济的革命：计划经济·自由化·寡头经济

麦克福尔相信经济转型对政治转型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经济转型能够改变政治转型的方向。但是，他还是将经济转型的分析放在了政治转型的后面。正如他所说，成功的革命有一个先后次序的特征：国家的变革在先，紧接着是经济变迁。^① 一个自主有效国家对国家的经济转型是必要的条件。^② 虽然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当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强国家自然需要从市场领域退出，但是在此之前一个强国是必要的。一个国家的转型不仅涉及到制度的变革，还涉及到程序、组织、规范和规则的变更。^③ 在麦克福尔看来，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叶利钦和盖达尔政府的急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不仅扫除了自苏联以来社会主义那样的使用“强力、暴力和集体谋杀的手段”完成任务的极权主义弊端，还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为俄罗斯的新型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④



在盖达尔的领导下，刚建立国家的俄罗斯立即放开价格和贸易管制，并接着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⑤ 这一私有化暴露出俄罗斯经济的许多问题，脆弱的经济基础和长时间的通货膨胀

① Mich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No. 47, January 1995, p. 213.
 ② 这一论点在麦克福尔的论文中已经得到梳理，参见 Mich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p. 213.
 ③ Michel 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p. 215.
 ④ *Ibid.*, pp. 225-230.
 ⑤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 153 页。



膨胀使得盖达尔当初坚持的“越到最后国家干预越少”的理念不断受到冲击。麦克福尔认为盖达尔在争取时间,即争取让经济衰退的时间早于社会信任度崩溃的时间。盖达尔清晰认识自己将不会在政府中担任长久的职位,所以他的目标就是在他退任之前俄罗斯的市场化变革已经得到稳定。^①

麦克福尔分析经济转型的范式与其政治转型的范式分析基本相符,其重要的目标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自由民主”。他自然地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为俄罗斯的政治改革扫清障碍。俄罗斯的经济改革的目的并不单纯,它是改变政治势力对比的重要手段。

这一点在随后的第二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盖达尔的私有化政策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获益,并牢牢确定其地位。产权、竞争和市场意识逐步形成,对抗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开始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一时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蒸蒸日上,而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有所进展。

然而,这一连续性被普京打破了。麦克福尔认为普京利用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采用非民主化措施。^②他使用公共物品(例如上图的自由住房指数)论证了在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GDP的高速增长是通过牺牲本来应提供给普通大众的公共物品和经济福利为代价。^③换句话说,麦克福尔认为,经济急速变革后的国家应该放下手中的权力,尽量少干预经济的发展变迁。但是普京的大政府逻辑完全改变了这一进程,“越大越好”成为麦克福尔讽刺的对象。这种经济转型在麦克福尔看来不是更好而是更糟,有走向安哥拉的寡头经济的可能。^④

麦克福尔于此将俄罗斯与中国和安哥拉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律”。^⑤有中国这样的权威国家的经济成功存在,同时也存在很多相同的失败国家如缅甸、刚果。^⑥而对于俄罗斯来说,稳定但缓慢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权威国家如中国这么好运气。麦克福尔在此得出结论,认为普京的冒险行动不仅摧毁了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不仅危害了俄罗斯的“自由民主”的建立,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经济的未来”。

三、民主化：美国的责任

作为影响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俄罗斯问题专家,麦克福尔在美国政府对俄战略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麦克福尔是奥巴马内阁的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不过其任务并不轻松。作为对俄罗斯民主强烈支持和对“俄罗斯极权回归”的强烈反感,麦克福尔的立场遭受众多的批评。许多人指责麦克福尔与国际上的新保守主义

① 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第155页。

② Michael Mcfaul,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8, p. 71.

③ Ibid.

④ Ibid.

⑤ Ibid.

⑥ Ibid.



运动有所联系，并称其为“冷战斗士”。^①而麦克福尔也并不隐藏其立场，在多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反感以及对普京的不满。^②不过，麦克福尔观点却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美国对俄政策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向的重要窗口。

麦克福尔极具美国特色的文章《民主和作为国际规范的民主实现》展现了他对“自由民主”的热切推崇，他拒绝同意德米特里·西美斯（Dimitri Simes）所提到的“追求普适的乌托邦会损毁美国利益”。^③他认为当今在世界上推广民主仍然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④：第一，民主作为一种国际规范比在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第二，今天将推广民主制度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比过去获得更多的认可；第三，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国家，推广它不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发展之需，只有这样，国际规范才能真正称之为国际规范。

麦克福尔根据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民主分析，确定民主是最好的政府体系。虽然上个世纪美苏之间的竞赛属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较量，而今，美国又遇到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的威权主义。^⑤这一系列的手的持续存在使得美国有必要加强对自由民主的宣传与推广。

这一立场非常契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观念，美国也是在这种立场之下发动了打击“反对自由民主的美国”的基地组织，打击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推进民主。

麦克福尔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实践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曾经帮助俄罗斯民主集团与西方国家取得联系，以支持其活动。在研究俄罗斯转型的过程中，麦克福尔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在莫斯科推广“民主”的重要性。在对叶利钦的评价中，麦克福尔就谈及，叶利钦和俄国革命者并没有享用设计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好处。^⑥他们要先处理好苏联解体后剩下的帝国，经济改革，政治变迁的问题。^⑦过去的阴影对后苏联时代的发展影响巨大，造成后苏联的“革命者”用暴力来解决转型问题。麦克福尔在表达对叶利钦的惋惜之情的同时大加批判普京主义，并认为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确定的未来”。^⑧正是这层坚定的价值观使得麦克福尔对小布什总统的第二届任期为了反恐与普京寻求合作而放弃“推进民主”的错误看法。^⑨麦克福尔认为，在前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国家建设的巨

① 关于美国坊间对麦克福尔的有趣的评论可见，“How Much Worse Can Obama's Foreign Policy Team Get? I Give You Michael McFaul,” January 17, 2009, http://tpmcafe.talkingpointsmemo.com/talk/blogs/dan_k/2009/01/how-much-worse-can-obamas-fore.php.

② 其中较为典型的文章有他在2007年为外交关系委员会所作的陈述以及2008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见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③ Michael McFaul, “Democracy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Issue 1, Winter 2004, p. 147.

④ *Ibid.*, p. 148.

⑤ McFaul, “Democracy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as International Norms,” p. 149.

⑥ Michael McFaul, “Yeltsin's Legacy,”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4, No. 2, Spring 2000, p. 51.

⑦ *Ibid.*

⑧ Michael McFaul, “Russian Democracy: Still Not a Lost Cau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1, p. 172.

⑨ Timothy F. Colton and Michael McFaul, “America's Real Russian Allies,”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6, 2001, p. 54.



巨大变迁时期,美国仅提供民主的信息,而却没有对其所做出的民主选择给予充分的指导。在俄罗斯的制度设计期间,美国仅仅对政党、贸易联盟和市民社会进行浅层的帮助,这些努力对俄罗斯民主社会的培育并不够。最后,当普京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限制民主发展的政治变革,美国竟仍然不去加以阻止。^①对于如何推进俄罗斯的民主,麦克福尔也提出了自己的3M策略:

首先,在特定时刻(at certain moments)涉及到特定议题,美国政府和大量的非政府主体要以积极的方式推进苏联和俄罗斯的民主化;其次,在危机关头(at critical moments)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应该要直接帮助俄罗斯精英组织独裁行动或者扭转这种行为;最后,在俄罗斯政治制度设计的关键时刻(at key moments),美国组织应该提供给俄方关于不同选举法律、法律实践、联邦主义等西方经验,为俄方提供观点、模板和进行此种决策的自信。^②

上述这些态度和措施反映了麦克福尔对俄罗斯的民主化的坚定立场。这无疑得到了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普遍赞同。小布什总统的处于反恐之需的考虑与普京交好引起了麦克福尔的不满,他认为这等于是承认了俄罗斯“独裁统治的存在”。^③

布什政府的最后任期并没有缓解与俄之间的矛盾,反而激化了美俄矛盾。而此刻美俄之间的政府改组也在悄然进行。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取代普京成为俄罗斯国家元首;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取代小布什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美俄两大国之间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无疑为美俄关系的重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内涵。美俄关系在2008年由于军事安全和格鲁吉亚的八月战争“阴云难散”。美国需要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新应付被“硬权力”过度使用的布什政府所带来的外交式微,提出了“巧权力”的概念,而梅德韦杰夫也在寻求各种方式积极谋求俄美关系的改善。麦克福尔临危受命,成为奥巴马的对俄幕僚的核心成员,对美俄关系的发展发挥重大作用。2009年,俄美关系的重启,不仅是奥巴马政府开展“巧实力”外交,化解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理念给美国软实力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也重新塑造了美国在俄国心目中的形象。作为奥巴马对俄幕僚的核心成员,麦克福尔一直强调与俄国“重启”(Reset)关系,多层次发展美俄关系。2011年5月31日,作为重启的设计师,麦克福尔被美国总统授命为俄罗斯大使,以表明美国继续增强对梅德韦杰夫的支持和改善俄美关系的决心。^④作为美国政府官员的麦克福尔,此刻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对对民主的推进的渴望也因为成为政界人士而有所回落。麦克福尔此刻关注的是,发展对俄的多维关系,而不仅仅停留在军控领域,强调导弹防御体系合作和支持俄罗斯加入WTO作为美俄的核心议程。麦克福尔从仅仅考虑推进俄罗斯民主到全面思考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其思想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转变,是从学界到政界的职能的转变。麦克福尔推进民主的责

^① Michael McFaul, *American Efforts at Promot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Russia: Lessons learned*, discussion draft, Sep 27th, 2004.

^② Ibid.

^③ Ibid.

^④ Joby Warrick, "Obama to Name McFaul as Ambassador to Russia,"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1st.



任将更多地依托在未来的可能继任者——梅德韦杰夫身上，而这次大使之任也隐含着美国对梅德韦杰夫连任总统的支持。

四、评论

站在 20 年的国际局势变迁的角度，可以清晰的看出美俄两大国仍旧影响国际政治的走向。而美国的外交和俄罗斯的内政仍旧是整个 20 世纪末全球所需着力应付的主题。一个向“内”寻求繁荣与强大的陆权大国和一个向“外”寻求霸权和发展的海洋大国的相互认知影响整个世界局势。作为一位在美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俄国专家，麦克福尔对俄罗斯的认识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既有在冷战时代养成的“反苏”情绪，也有在对苏联解体之中和之后的“同情”。麦克福尔一直号召俄罗斯民主化，同时也强调发展美俄关系，提升美俄合作水平。虽然在 9·11 恐怖事件之后，美国得到了俄罗斯的坚定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俄关系将此改观，美国要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和平只有在苏联解体之后并且民主价值观在整个俄罗斯存在的时候才会出现”。^① 美国需要新的盟友，而不仅仅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权宜之计，并为俄罗斯提出了成为“美国盟友”的主要标准。美国不仅作为一个霸权国承担全球公共物品的责任，而且必须要坚定支持俄罗斯等后共产主义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道义合法性是美国走到现在的重要因素。^②

对于美国而言，民主化“俄罗斯”还是一条很长的路，是“未完成的革命”。^③ 麦克福尔也看到，“可控民主”下俄罗斯是长期存在的现实，而欧亚大陆也呈现出不同于“美国式”民主新型政治景观。美国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先从改善美俄关系入手，将美俄关系作为民主化俄罗斯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支持“自由民主”精英，达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转型的目的。但是“美国式”革命在俄国大地上能否成功，这仍需长期观察。但从近期上看，美俄两大国的海陆文明所带来的“内”“外”型的对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俄罗斯国家精英不会轻易允许西方“民主化”革命在斯拉夫的大地上发芽生根。

[责任编辑：邓子立]

^① Joby Warrick, “Obama to Name McFaul as Ambassador to Russia,” May 31st.

^② Angela E. Stent, “Russia and America: How Close an Embrac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0, No. 4, Winter 2003/2004, p. 75.

^③ James M. Goldgeier,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inted by R. R. Donnelly, Harrisonburg, Virginia, 2003.

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编者按】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巨大而快速的变化给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严峻的挑战，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也使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如何看待纷繁的世界是重要的人类命题，而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现实的窗户。本期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



一、作者简介

罗伯特·吉尔平出生于1930年，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政治系，目前是该院艾森豪威尔公共与国际事务荣誉教授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itus)。从美国海军退役后，他先后担任了美国政治学会的国会研究员 (Congressional Fellow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哈佛大学科学与公共政策项目研究员 (Fellow of th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at Harvard University)、勒曼研究员 (Lehrman Fellow)、埃伯研究员 (Abe Fellow) 以及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 (Vice-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并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他曾到伦敦经济学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64)、日本国际大学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Japan, 1984)、欧洲大学研究所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 Florence, 1989) 等世界各地高等学府做访问。

其主要著作包括：《美国科学家与核武政策》(American Scientists and Nuclear Weapons Policy, 1962)、《科学时代的法国》(France in the Age of the Scientific State, 1968)、《美国权力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975)、《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国际经济学》(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2000) 和《全球经济学：国际经济新秩序》(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2001)。大多数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有多部获奖。

二、自我认知

吉尔平被视为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然而在纷繁的现实主义流派分野中，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社会和政治性质的哲学立场，而现实主义本身并不是科学。因为科学可以用来证伪，



但是现实主义不具备可证伪性,只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吉尔平在分析政治事件时,主要关注行为体的利益和权力,除此之外也注意分析观念等。而且在他看来,宗教等意识不是外生给定的,并且宗教等意识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大师的学术经历和感悟往往是学者们的兴趣点所在,这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借鉴,也激发了他们继续学术生涯的动力。在每个学者的成长阶段,良师益友必不可少,他们不仅能给予思想上的启发,也能提供现实的帮助。

初涉国际关系领域时,吉尔平跟随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和保罗·西伯里(Paul Seabury)在加州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读书。那时盛行“新社会科学”、集团理论和行为主义,但是吉尔平却从未青睐过这些方法,这是因为他深受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影响,他认同摩根索强调的观点,即必须从国家行为体的视角观察国际政治,关注行为体的行为、利益和权力。吉尔平认为过于强调基于特定规则或逻辑的体系会忽略很多东西。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摩根索的门徒,并指出《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仍然存在学术缺点,如摩根索把客观因素与道德因素放在一起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除了摩根索之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英国作家以及历史研究也影响到了吉尔平。尤其是刘易斯·费尔(Lewis Feuer)的研究引发了吉尔平对学术的热爱。

当然,除了特定的个人印象外,有关延续性与变迁性的问题在吉尔平的思想中也至关重要,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政治思想,甚至在教学中,吉尔平会指定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第一章作为阅读材料。他对修昔底德思想的解读是,外交和外交政策本来可能干预和阻止体系的两极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战争的爆发。这就没有我们认为“囚徒困境”那么绝对。

三、物质与意识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物质性力量和意识性力量的关系的争论是精彩而激烈的。注重物质性力量的学者往往强调历史、经济和技术等“硬”方面,而注重意识性力量的学者则将身份、规范和情绪等“软”方面置于优先位置。那么,非物质性因素如心理认知、精英阶层的判断等在国家对外行为中的作用涉及到的就不仅是政策的制定,也关乎民意的反馈。

在吉尔平看来,身份是由利益和权力所建构的,而独立于国家和权力。私人利益之外的政治意志不会塑造身份认同,认同来源于共同的经历尤其是战争,意大利人可能会比人们所理解的更趋向“意大利式”。他认为在19世纪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统一德国的战争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德意志认同,是战争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他同样把这个理解用于南斯拉夫问题上:在美苏争霸时期,南斯拉夫的许多矛盾包括民族意识都是被压抑的,直到冷战结束后才觉醒,他们对于自身是“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的认知既是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又是结果。欧洲认同也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如苏联,共同的威胁和团结才会巩固认同意识。



吉尔平将意识和物质的问题具体化为对外决策之中的道德和国家利益,尤其是在美国这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相互交织的国度里。他认为在布什发动“反恐战争”之后,美国人对于国家利益和道德的判断模糊了,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没有通过政治斗争做出抉择。而且,在伊拉克战争中由政府最高层秘密制定的外交政策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很多人(如国务院高层和专业的军事人员)知道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错误、愚蠢而危险的,也知道阿拉伯世界会反对战争。与官方宣传的一样,很多人把伊拉克战争当做对抗邪恶、推广民主的一种方式,认为这样做是伟大的。但是美国人逐渐清醒了,也慢慢明白发生在伊拉克的一切是那么糟糕,而且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吉尔平认为,与美国传统的对外政策不同的是,布什创造了另外一种更加具有侵略性、干涉性和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政策。这就部分地支持了观念意识是变革动力的观点。而许多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布什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更希望未来对外政策的制定由利益来主导而不是由意识形态来主导。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

吉尔平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国际政治经济学》历来被视为霸权稳定论的经典之作。该理论阐述了霸权领导国的存在和持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维持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繁荣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英国与美国的霸权领导为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和平与安全的环境。

他认为,国家与市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理论因素。然而,这两者的逻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矛盾的。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是获取和占有经济活动的好处,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这两种逻辑影响着当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及其演变。

在他看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即世界经济中那些比较持久存在的方面,如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以及支配经济活动的种种规则和制度。此外,吉尔平认为,国际货币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反映出当代国际政治协调与合作的现状。

五、全球化

吉尔平指出,全球经济的开放和一体化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广泛、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已经立足于、将来也必须继续立足于可靠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的前提是:领导国的存在、大国的合作以及公众的支持。冷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正经历着一场最深刻的变革。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挑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贸易自由化总受到保护主义的威胁,这一威胁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一步加剧。世贸组织的成立及其改革措施的实施,也未能解决国际贸易体系的不稳定问题。贸易自由化



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摩擦将会继续威胁全球贸易体系。第二，固定汇率制度瓦解以后，全球一直未能确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设计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困难重重。吉尔平认为，主要原因是各方对于国际货币体系适用的经济模型、理论和具体方法等意见不一，国家货币自主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很难同时兼顾，国际货币稳定和国内经济自主性之间存在矛盾。而一个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有赖于牢固的政治基础，这种基础在战后初期来源于美国和盟国的合作，可是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的政治分歧也意味着以制度化的政策协调和严格的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再也不可能出现，或许“危机管理机制”是在未来可以尝试的办法。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救助机制是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最突出特征。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暴露了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这表明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管造成的严重后果会使世界经济付出极高的代价。最后，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其行为已经对全球财富分配和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和投资对象国的自我保护，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会遇到困难。此外，区域化的快速发展也构成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挑战。比如欧洲一体化运动、北美区域主义和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这将会加大地区保护主义的力度，对建立更为开放的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吉尔平认为，全球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同时又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全球化的发展也将会构成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六、国际关系研究现状

吉尔平以现实主义视角看待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变化与发展。他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要控制形式，同时权力的相对大小决定了民族国家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能力，相对权力最大的国家拥有对国际体系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世界经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民族国家的政策，但是，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以上观点都体现了其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学术倾向。并且他认为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取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仍是对国家之间权力发展不平衡的后果进行和平调整的问题，由于世界正处于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战争和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权贤美 王芳琳 石宇 供稿)

[责任编辑：任娟]



主题法与问题法

弗雷德·埃德林*

内容摘要：学生经常困惑于研究型论文的写作。一些文章、讲座和书籍往往仅有令人兴奋的主题，但内容十分乏味。这些现象普遍存在的弊病在于无意识地集中于主题而非问题的方法论习惯，而这种习惯是以根深蒂固的常识性知识和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的观点为依据。这种观点涵盖了对大部分方法论教科书所假定的科学探究的理解。本文批判了“主题法”，并且将它与“问题法”进行了对比。“主题”一词表明将涉及到一定的范围，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涉及这些范围可能是有趣的。有趣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是以目前知识所存在的漏洞及相应解释作为研究的起点。问题导向型研究不是以信息搜集、事实或者概念的阐明为起点，而是以目前知识的不一致、前后矛盾或者空白的鉴别为起点的。问题导向型研究试图通过自由、不受约束的创造力，以及对假说的严厉批判来解决问题。

某一个学生对我说：“我已经就已选定的主题进行了大量阅读，但还是不知道怎样写论文。”某一个同事跟我谈起一些有关主题的工作，比如反贫穷政策、巴尔干民族主义或者阿以冲突。“主题确定是这样，但是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呢？”我问，“你最好奇的是什么？哪些令人费解的问题需要回答？”

上述案例的弊端在于，不带着具体问题进行探究，我称之为“主题主义”。主题主义不仅是还没有真正把握如何进行研究的学生的通病，而且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的专业学者。主题主义以根深蒂固的常识性知识和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的观点为依据。

“主题”一词源于希腊语。“为主题划定范围”表明一个主题会涉及一些内容，就好比待着色的墙壁、待雕琢的空白板岩或者待写的白板。而在学术研究时，一个人尝试去到图书馆去“搜集信息或事实”。这种根深蒂固的有关探究的观点源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提出的“标准科学方法”，而这种方法现在依然在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上被讲授。“一个发现者只是勤勉地观察事实，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其他的则取决于孕育万物的大自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自然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因此无须解释)”。换句话说，科学方法被看做是“让自然直接对我们讲述它自己知识的方法”。理论只不过是不断重演自己的真实世界规律的速记。因此，甚至理论也只是对主题所涉及现象的一种表述形式而已。

我建议将问题法视为一种可能更有效的备选方法。问题法是当前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标准模式——至少是在前沿的自然科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并不完全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主题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十分猖獗。

对知识的探索，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不是从准则、观察或者数据和事实的收集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为了了解要观察什么，我们心中要知道那些被观察所左右的问题。”观察从来不会凭空产生，而是被那些受观察影响的问题所主导，或者被

* 弗雷德·埃德林(Fred Edilin)，现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的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科学和理论的基本问题、比较思想和修辞学、后共产主义转向(尤其是前苏联、捷克和东德)、大国外交政策等。本文由孙迪、王芳琳、权贤美、任娟、姜忆楠翻译，姜忆楠、邓子立校对。



那些已经建立、并由于某种原因相关的种类所主导。每一个问题都源于那些与知识不符的现实发现，或者源自知识推论和事实归纳之间的明显矛盾。

从同一视角出发，默里·戴维斯（Murray Davis）认为“只有当新的理论否认了旧的事实（谚语、理论等）时，这个理论才会被注意”。他认为，有趣的理论与无聊的理论的区别在于，有趣的理论会否认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某些部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挑战而是仅仅确认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信仰，其价值通常不被承认。学界会宣称这个理论不需要关注，因为这已经是现有理论的一部分。

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摒弃一切偏见的基础上，即摒弃一切偏见是可能的。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些不偏不倚的理论，包括我们的观察……我们总是去寻找那些已经存在于理论背景中的问题”。背景知识不仅包括以结构化的形式综合各种理论的语言，还包括那些目前还没有被挑战过的理论假设。甚至我们的感官自身也具有受到理论塑造的预期，会无视理论未能推导出的现象。因此，只有在与现有或之前存在知识、预期、理论相关的问题的指导下，新的观察才有可能成为新理论的起点。

“问题”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problema*”，意为“障碍”。根据障碍种类的不同，问题也可分为不同种类，如实证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等。在科学理论中，知识性问题就是障碍。同哈蒂唐斯（J. N. Hattitangdi）的观点相似，我认为问题是有待解决的逻辑上的矛盾。

一、逻辑上的前后矛盾：研究的驱动力

“什么在激励着研究？”哈蒂唐斯说道，“那些为解决问题而不断寻找的理由与问题本身，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或许植根于所持的明确清晰或者缄默的信仰、对观察的理解、考虑正式采纳的假设，或者是以上的结合。信仰不一定有意识地成为问题的组成部分。研究的开始可能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即有些事情与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不相符。我们也许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使之成为问题。将逻辑上矛盾的知识信仰全部列举出来是如此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无意识中所持的信仰（例如那些深嵌在语言和方法之中的信仰）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它们非常难以认知和清晰表述。正如庞加莱（Jules H. Poincaré）指出的，“无意识所持有的意识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逻辑上的矛盾会促使人们去寻求解答？“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有系统性的影响”，哈蒂唐斯指出，“它摧毁了我们信仰体系的效率，前后逻辑矛盾会从任意一个陈述开始，并迫使我们寻求一种新的解释，而那些无法解释的部分则削弱了我们的信仰体系”。

“当预期令人失望，或者理论进入困境时，问题就会出现。它们可能从一种理论或两种理论之间产生。它们也许源于我们的理论和观察之间的冲突。理论通常产生于，我们对遇到的问题持有一种试探性的答案。这就是挑战我们学习、试验、观察的问题。只有结合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预想和理论展示了一个问题时，那些观察、事实或数据才会成为疑问的起点。”

二、背景假定和认知兴趣：问题的根源与可能的阻碍

人们所提的问题总是强烈依赖于他们的背景知识和兴趣点。迄今为止，这种差异没有中断科学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不同构架之中得到的发现可能是互补而非相互矛盾的。



虽然禽类学家、昆虫学家、园艺学家和真实的土地代理人可能把相同地皮的事实集中起来,然后给出完全不一样的报道,但是也许所有的报道都是符合现实、彼此相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经常给出不同、矛盾的现实报道,这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理论假设和背景知识。这些不同报道是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的,也许只是基于相同现实的不同认知。而背景假设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如果一个人相信自私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有消极的影响,那他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论证的“自私的行为会对公共产生积极作用”将会感到惊讶。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相信斯密“看不见的手”总是促进公共福利,那么他将不得不解释那些明显与之不相符的事例。如果一个人因意识形态而信仰社会主义,并遵循民主规范,然而当罗伯特·米歇尔(Roberto Michel)观察到社会党人倾向于被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领导统治,那他同样会吃惊。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真正问题的特点在于,解释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及其政策结果的差异。一个人会假设政策制定者想要使得政策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当然,没有人愿意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那些在预期不会成功的政策上,然而实际上政策通常都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呢?所有这些例子说明,对于不持相通知识背景假定的人而言,一些问题可能就不再成为问题。

三、自主事实的观念是真理的试金石

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持寻找解释这一目的,而这些解释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正如上一部分讨论过的,对于同一个事实也许有非常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都是正确的并且相互之间具有连贯性。兽医、微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对同一种动物的解释可能都是正确的,而且整体上相互之间保持着连贯性。只要他们对事实的判断是一致的,那就没有问题。当然,在不同理论模式下提出的假设经常是相反的,因为这些假设植根于不同的理论模式。科学辩论中的所有参与者认为,自主事实(autonomous reality)存在于一切理论模式之外,因而它可以成为评判真理或谬误的检验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由某个理论或者所有这些不同的理论提出的假设,都能在事实面前通过激烈的讨论得到验证。

正是这种理论模式之外的事实假设独立于任何人的主观看法,才使科学变得完美。这种假设与事实陈述是一致的,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对事实陈述的诠释,另一方面事实陈述却受到包括运用的理论在内的背景知识影响。当研究者发现事实与理论模式(或者范式)发生冲突时,他们通常会坚持理论模式而挑战经验事实。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正如波普尔说过的,“当它们与预期发生冲突时,观察甚至会摧毁模式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对我们的预期产生出乎意料的影响。这种意想不到的影响迫使我们重新建构预期……”。

经验事实和人们对事实的看法因人而异。当然,感知、诠释和解释都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这种偏好不可避免地表明证实或证伪都是不确定的。当对每个可能错误事件的观察都有解释时,任何证伪也只是表面上的证伪。不过,我们可以从前沿的自然科学学会重要的一课:知识有时通过创新和对解决问题前的假设的批判(包括检验)取得进步。

四、无意识

科学和尝试中的很多背景假设来自于语言、文化、传统和其它资源。通常在无意识中我



们就能够理解它们，甚至都不会注意到我们会有如此多的信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经常与他人谈起过去。背景假设通常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而误会的产生原因通常在于，不同的人认识到不同的自认为显而易见的真相。经常只有当我们遇到新的理论或观察与我们无意识的背景知识假设发生冲突时，我们才会注意到这些差异。

任何学科领域的争论经常由时兴的理论、方法和隐喻性观点组成。在自然科学中，很多背景假设都源于范式的、科学的或者隐喻性的研究计划。迈克·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已经注意到了他称之为“了然于心的对初次体验产生意义的知识”的重要性。科学中的很多背景知识是人们熟知于心的，也就是说，通过实践获得但是不能清楚说明。熟知于心的知识是指对哪种观点应该采用、而哪些不应该采用的判断。熟知于心的知识通常是无意识的，也许这正是阻碍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不存在解决问题的现成教条

一些读者可能认可我所提倡的方法，以及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东西。问题导向的研究并非为先进的自然科学所垄断，许多古典的以及当代的社会科学成果也都是问题导向的。一个人只需要想到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莫斯卡（Gaetano Mosca）、米切尔斯（Robert Michels）、凯恩斯、尼斯比特（Robert A. Nisbet）、谢林（Thomas Schelling）、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巴伯（James David Barber）、达尔（Robert Dahl）和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等，甚至足以列出一长串人名（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问题导向的）。很多古典和当代的政治思想家的工作无疑也是问题导向的——如柏拉图、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卢梭、康德和罗尔斯，这又能够列出许多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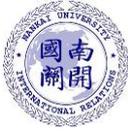
然而，当简要梳理社会科学文献时，我们就会发现主题导向的分析已经肆虐。此外，不仅仅是学生缺乏可以聚焦的问题来引导其研究，很多学者（包括很多享有盛誉的学者）也是跟着研究方法走，却不管他们是否了解该研究方法。不仅是无数的学生论文，还包括无数的学术演讲、书籍和论文，它们都因为缺乏研究问题而显得无趣。

问题导向型研究与非问题导向的研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在于描述和解决问题。在自然科学研究前沿，科学事业的实质是描述。描述性研究与理论密切相关，此类研究的相当一部分涉及到解决问题。两者的决定性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描述以问题为中心，不面向主题；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描述研究以主题为导向，不强调问题。

与其让导师帮助自己明确理解一个问题，在论文中挣扎的学生常常更倾向于获取某一模板，利用这一模板，学生可以得到有关写作提纲、研究程序或步骤的范例。这些模板常常能“帮助”学生完成他们的题目，却不必提出问题。在社会科学中，甚至一些被冠以“理论”之名的成果也以模式化的形式出现。将数据用一些所谓“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术语述说一遍，如此一来，一项研究议题即使不用提出问题也能成形。

方法导向的研究更可能是“主题中心”或“模板导向”，而非“问题导向”。大多数的方法论教科书，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都会提供给学生模板。教科书提出的研究程序倾向于引导学生进入“主题中心”型研究而非“问题导向”型研究。

在有关方法论的教科书中，缺乏对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与“解释”的关注，这个问题



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在时下的讨论中,学者们在使用这些词语时也很少建立在求知主导型研究的意义上。在很多广泛使用的方法论教科书中,“问题”和“解释”两个词语甚至不会出现在索引中。在其它一些作品中,尽管这两个词(或单个或同时)出现了,但有关它们的讨论通常是仓促的。在求知主导型研究的意义上讲,这些词语通常不被使用。有时甚至强调问题重要性的教科书会把问题和主题混淆,或者教科书提供的有关问题的案例确实很重要,但细究起来涉及的却是经验问题、伦理问题或是政治问题,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这些教科书通常并没有帮助学生真正、理性地阐述和考察问题,而是教授他们如何“收集”和“汇总”数据,以及寻找相关关系。

“问题”和“主题”很容易混淆。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在日常语言和学术调查中都容易被混用。问题常常被当做主题使用,而主题也常常被当做问题使用。这种混淆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主题即问题”(problems are questions)。这一主张貌似正确,但无法回答无用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什么区别。

很多社会科学家,甚至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将研究视为汇总数据、寻找对假设的支持和阐明概念的过程,以及对现实进行积累和组织化的过程。正如波普尔所说,“他们试图复制自然科学的方法,却没有把握方法的实质,而是采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或者,像戴维斯写到的,那些“死死遵守现行教科书中有关理论建构的强制教条”的学生,不考虑有关其理论建构的其它标准,最终会发现其研究工作索然无趣。

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就像很多主题论者热衷的那样,但进行事实上的问题导向研究却是另一回事。人类的心灵不适应开放的问题,并且常常试图忽视和压制它们。渴望遵循旧例是可理解的。模板试图将其规定固化到研究之中。“本体论概括和叙述了方法论”,也就是说,源于调查的现实图景被研究使用的方法塑造和染色。

遵循模板并不必然导向主题主义。案例、科学研究程序、形而上学的研究程序和科学理论都是模板,在研究中可以作为粗糙的路线图使用。在前沿的科学研究中,当这些路线图遇到了麻烦,或是指向了违反常理或未知的结果的时候,研究才开始。保持对问题的灵敏度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标志性品格。

系统阐述研究问题是一个难题,这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努力。而且,问题通常会随着研究者发现一些默认的潜在假设过于幼稚或存在其他错误而消失,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这就不是研究了”。对于开放问题的探究需要对于模棱两可状态保持很高程度的忍耐。从来没人能保证一位科学家能够成功的、哪怕只是系统阐述一个真正的问题,遑论寻找解决途径。

问题法没有固定的教条。

[责任编辑:邓子立]

“南开国际关系论坛 2011” 在我校举行

(通讯员: 李金潼) 2011年11月12至13日, 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办的“南开国际关系论坛 2011”在省身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外交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4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

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负责人出席论坛开幕式, 副校长朱光磊出席论坛闭幕式并致辞。

朱光磊在闭幕式上代表南开大学对会议的举行表示祝贺。他简要介绍了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和状况, 并对兄弟单位多年来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 加强国际



问题的研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国际关系学科是南开大学的新兴学科, 尽管建系时间不长、规模相对较小, 但在国内学界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色和影响力。他指出,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科需要加快资源整合, 引进更多优秀人才, 为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作出应有贡献。学校将继续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希望各兄弟院校、科研单位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引进等方面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合作。

本次论坛由“当前世界国关学科发展前沿”、“中国国关学科发展的进展与不足”、“中国国关研究创新的突破方向”、“中国外交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以及“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等专题讨论组成。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 从自身研究出发,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00余名来自南开大学各学院的同学也参与了此次论坛, 同学们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与战略研究前沿探讨

——“南开国际关系论坛 2011”会议综述

刘丰*

2011年11月12至13日,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办的“南开国际关系论坛 2011”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并就“当前世界国关学科发展前沿”、“中国国关学科发展的进展与不足”、“中国国关研究创新的突破方向”、“中国外交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以及“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等六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当前世界国关学科发展前沿。与会学者关注了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对外政策分析等主要分支领域的前沿进展。

根据与会者的评述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呈现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第一,研究者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兴趣从宏观理论转向中层理论。近年来,随着几大主流理论的内部发展趋于沉寂,学者们更加重视问题导向型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对外政策分析等分支领域,围绕诸多具体议题涌现出一大批尝试构建和应用中层理论的研究成果。第二,国际关系研究学科特征和趋势进一步加强。20世纪中



▲论坛第一节主席台一览

后期以来,在理性主义的推动下,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反思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向哲学、历史、法学等传统学科回归,也主张借鉴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领域的知识。第三,国际关系学科逐渐有意识地挣脱美国重心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这一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自身的特色,比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问题研究都深受本国的知识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影响,近年来也开始对美国的知识霸权提出了挑战。

* 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论坛现场一览

(二) 中国国关学科发展的进展与不足。在回顾其他国家和地区学科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与会学者也就近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与会

学者主要从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理论自觉意识的加强、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运用以及学术规范的加强等方面肯定了近十年来中国国关学科取得的重要进展。当然,与会学者也意识到,在下一个十年中,中国国关学界既面临理论创新上的重要难题和挑战,也需要因应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外交实践提出的现实问题。具体而言,目前学界还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1)既有研究成果中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的比重较大,具有普适性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相对较少;(2)由于知识训练背景和学术旨趣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学者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不适应国际关系研究议题多样化、视野多元化的趋势;(3)国际关系教学是坚持学术导向为主还是实践导向为主是一个缺乏共识的问题。

(三) 中国国关研究创新的突破方向。如何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议题或概念等方面形成创新性研究,并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形成影响是与会学者普遍关注的议题。

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需要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经验数据等多方面予以加强。但是,与会者对当前应该强调其中的哪些方面提出了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还需在继续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创建新的理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掌握不足是制约研究创新的最大障碍;也有观点认为,我国学界在档案资料运用、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亟待加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其他相关学科。一国际关系的多样研究者具备多学开阔的学术视野,史、国际法等传统代社会科学研究。也有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借鉴不



▲本文作者在论坛中提问

创新也有必要更多借鉴些与会学者认为,性和复杂性要求科的知识储备和既需要借鉴外交学科,也需要借鉴现学者认为,跨学科借鉴应仅仅以西方其他社会科

学门类的发展,也应该关注国内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和创造。

中国学者还需要关注和解决中国问题。从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性质上看,知识创造是普遍性的,但是不同国家及其所处时代的现实需求必然会影响本国的学术研究。有与会者指出,以依附理论为代表的拉美学派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科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因为拉美学者立足自身所处现实、提出了符合自身经验的概念和问题。以此为借鉴,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也需要从中国自身经验出发,回答在中国发展和对外交往中产生的重大现实问题。

(四) 中国外交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实力的崛起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也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如何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定位是与会学者讨论的焦点。

理解中国的国际地位,首先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国家实力进行准确判断,并且对中长期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作出合理预测。大部分与会学者对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作出了乐观的预期,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中仍然能够保持发展势头,而西方国家会继续走向衰落,国际力量对比将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与会学者也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一些发达国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一些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为它们提供更多资源和援助。部分与会者认为,中国自身也面临多重挑战,在国际责任和国际援助时,中国需要在国际地位和形象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也有部分与会者指出,中国可以更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赢得国际声誉。

(五) 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尽管中国的发展前景良好,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毋庸置疑。与会学者主要从中美关系、东亚安全合作、中国外交的布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于中美关系,与会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疑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持续,中

起过程中美国的核正面挑战,的国力发关于东亚学者普遍亚地区的临巨大风南海问题由



▲第五节论坛现场一览

国在和平崛起需要避免对心利益构成以保持自身展为核心;局势,与会认为当前东亚安全环境面险,尤其是于美国战略重

心东移和其他区域外国家的介入而呈现出日趋复杂的态势,中国需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磋商与海上安全合作;关于中国外交的布局,有学者提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巨大期待凸



显出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和外事工作面临的繁重任务,中国需要不断加大对外交的资源投入,重视利用公众外交、民间外交等非官方外交渠道塑造国家形象。

(六)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能够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次论坛最后讨论的主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成功的增长范例,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借鉴。中国已经继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传统经济力量之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中国的发展可以被视为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机遇,其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道路。与会学者也强调,中国是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中国崛起带来了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增强了维持世界和平的力量,并且对既有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内容提出了质疑,为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改革与重塑提供了机遇。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将会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学者需要深入挖掘和探讨中国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与现实发展,为中国学界的理论建设和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贡献智慧。

2011 国际时事年终盘点

【编者按】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历史画卷即将翻过 2011。回顾这一年，日本九级地震、神八升空、本·拉登死亡、利比亚 42 年极权统治终结……2011 年世界风云激荡，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印记。战争与和平、灾难与救援、欢笑与泪水、呐喊与祈祷……多少昔日风流，化作历史的尘埃；多少瞬间震撼，从此为世人铭记。展望未来，2012 绝不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但能否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仍难以预料。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时代的变革已不可避免，新的一年，乃至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注定不会平静。

辞旧迎新之际，《新视界》编辑部有感于一年来国际舞台上的云谲波诡，特设“年终盘点”栏目，回顾 2011 年的国际风云变幻。

1. 阿拉伯世界政局动荡

一名突尼斯年轻男子在今年 1 月点燃了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和革命之火。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下台后，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也在 2 月 11 日宣布辞职；10 月 20 日，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捕后因伤重死亡，利比亚正式进入“后卡扎菲时代”；也门总统萨利赫在秋天下台……从埃及到利比亚、叙利亚再到也门，阿拉伯国家连续出现政局动荡、领导人更迭，中东政局持续动荡。



➤ 专家解读

加强政治民主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从北非、中东国家民众抗议示威中提出“反独裁、反贪腐、求变革、争民主”的要求看，这些国家执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自身建设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是腐败现象严重侵蚀着社会公平公正，引发了民众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其次是执政集团内部的离心分化助推了政局动荡。这些国家统治集团的执政理念得不到民众认同，内部权力斗争由来已久，政府在应对突发危机中严重分化、离心，加速了政权崩溃。三是政治体制僵化、领导人长期揽权专制、压制民众参政议政和表达意见，民众对现存体制倍感失望，求新思变的诉求迅速蔓延并酿成了骚乱局面。一个政权要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政治民主建设和执政集团的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夯实执政基础。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吴志成

中东地区可以预见到的持续动荡将给欧美在中东的原有战略利益和战略架构带来重大冲击。特别是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持续高油价、加速流出的北非和西亚难民、未来以巴和平的新形势以及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等不确定性因素，有可能不仅拖累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加大全球通胀压力，也可能迫使在中东地区占据战略主导地位的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中东战略，调整其中东战略的传统重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锋

中东阿拉伯国家将会按照自己的节奏缓慢发生政治转型。在这场剧变之中，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穆斯林兄弟会等极端力量没有登台表演，而是静静地观察局势的变化。在埃及等国家，随着政治重建和选举的展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降温，摇身一变成为体制内的政治竞争力量，“政治伊斯兰”成为这些国家极端力量的战略。这些国家正在效仿土耳其，把宗教力量世俗化，通过世俗政治的游戏规则改造宗教力量，如果这一改造成功，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化将更加明朗，中东政治的草根化和地区化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赵可金

➤ 学生视角

郭晓琼：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独裁者的倒台，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政府的让步，这些似乎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带来了曙光。伊斯兰民族将要“觉醒”，人们也试图打破独裁的禁锢。然而至今依旧动荡的局势不禁让人们思考：阿拉伯世界真的会迎来“民主”吗？民众与政府、党派与党派间复杂的矛盾无疑很难让阿拉伯世界拨开迷雾去迎接真正的“春天”。

杨家嘉：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今年发生了一系列动乱事件，虽然西方国家称之为“阿拉伯之春”，但这一系列的事件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多少好处。这一地区十分敏感与脆弱，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在这里交相汇集。而众多事件的背后往往又有大国之间的博弈。

杨雪：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变动，伊斯兰国家是否会相继改变国家制度，美国是否能控制中东地区，都是令人生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会在地面作战，培植反对党成为了最新的“殖民”方式，我们不是很乐观地看到美国的手段又再次“升级”了。

2. 日本发生 9.0 级特大地震，强震致世界经济“海啸”

北京时间 2011 年 3 月 11 日 13 时 46 分，日本本州岛东部发生里氏 9.0 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 130 公里处，震源深度为 24 公里。地震引发了强烈的海啸。仙台港遭到 10 米高的海啸袭击。

➤ 专家解读

近年来，日本环境外交顺应全球环境保护发展趋势，期望通过参与和倡导国际环境对话与合作确立环保主导权，通过每年主办“亚太环境会议”，主导推进亚太地区各国环境政策对话，积极向亚太地区推广日本的环保理念及技术资源，对世界



承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其成效和影响得到了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问题，是对日本环境外交的一次沉重打击，严重影响了日本所谓“环保大国”



的形象。为此,日本在坚持既定国际战略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外交策略,化解福岛核泄漏造成的负面国际影响,灵活发展对外关系,引导国际舆论朝着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如何加强核泄漏信息的透明度,化解亚太周边国家的环境安全疑虑,推动亚太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将是日后日本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调整的重点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吕耀东

众所周知,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已成为改善中日两国关系的关键。而这次灾难为两国人民相互认识对方提供了一个敞亮的窗口,面对灾难,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相互支援。相互慰问,共同哀悼死难者,体现了超越国家、民族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显示出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宽广胸怀,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心灵沟通,使中日两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拉近了心理距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冯昭奎

此次日本大地震对日本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电力以及供应链的破坏程度较大,短期对实体经济以及消费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从金融面来看,日本银行的积极应对弥补了政府乏力的弱点,加上日本的对外债务相对比较少,因此通过杠杆效应对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影响较小,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向的大格局。然而无法忽视的是,日本政府债务的规模庞大,在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中如何保证灾后复兴财源,日本正处于牺牲内需和忍受日元高涨的两难抉择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工资增长几乎停滞不前,既存在伴随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而产生的产业空洞化问题,也存在由于日本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度较低、长期利息偏低而形成资本流向海外而产生的金融空洞化问题。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日本不能借此契机对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整,日本可能会面临政府财政破产的危机,届时不仅对日本自身,对国际金融及资本市场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袁堂军

➤ 学生视角

于凯玥:3月11日,日本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人员损失,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我想到,应对天灾要防患于未然,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护措施,由于日本位于两大板块交界处,自古地震多发,因此日本政府和人民在预防和应对突发地震方面显示出来的镇定和成熟值得我们学习。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过多地依赖他国,否则在应对外界突发事件时将会变得很脆弱。

日本地震造成的损失之中更严重的是福岛的核泄露,福岛核危机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核能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开发利用和控制核能能给人类输送大量清洁能源。然而,“核”同时也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物质,疏忽管理以及非和平用途则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甚至毁灭!

马壹粮:这两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恰巧重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既是天灾又是人祸。地震造

成的损失虽不可避免,但是可以竭尽所能地采取预防措施。而福岛危机则是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日本政府并没有对核设施进行充分的安全考察,并做出了错误决策,造成了不必要社会恐慌以及强烈的社会反响。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充足的教训,“预则立,不预则废”,有准备才能不恐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核能的安全利用。

3. 本·拉登被美国军方击毙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1日深夜发表电视讲话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一处住宅发起针对拉登的“定向”行动,双方发生交火,本·拉登被击毙,其尸体目前在美方手中,美国方面已对本·拉登的尸体进行过DNA检测并确认了身份。

➤ 专家解读

拉登之死为我国清除“东突”等恐怖组织提供了良好机遇。一方面,拉登之死为各国消灭基地组织影响和规劝塔利班放下武器提供了良好契机。伴随着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威胁逐渐减少,中亚地区各国将能投入更多精力在剿灭包括“东突”在内的地区性恐怖组织之上。另一方面,拉登死后美国将逐渐从中亚反恐事务之中抽身,这将为我国带来领导地区反恐合作的机会,也有利于我国将该地区反恐合作重点放在对我国威胁较大的“东突”等组织之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袁鹏

2011年5月2日,“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击毙。拉登之死,是国际反恐斗争的“积极进展”,也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十年来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犹存,“后拉登”时代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影响地区稳定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多,局势更趋复杂动荡。为此,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与地区安全稳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荣鹰

除了有利于反恐外,通过打死拉登展示美国的能力和意志,还有利于美国加强在盟友中的威望,让它们更加坚信美国有能力保护其安全。同时,对那些有反美倾向的国家也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这无疑有利于美国推进霸权战略。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建飞

➤ 学生视角

庞强:本·拉登真的死了吗?他的肉体已死,但他的继承者却会继承他的仇恨,一个拉登死了,千千万万个拉登会站起来,他的敌人——美国——也会更加恐慌。拉登之死只是一种象征,制止不了恐怖主义与反恐势力之间的争斗,反恐运动还将继续下去。

吕海: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 作为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的头目, 本·拉登死于非命。然而, 我们应该看到, 在伊斯兰世界仍然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活跃着。回顾历史, 我们也会发现, 在两极格局结束之后到“9·11”之前,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伊斯兰世界内的恐怖主义十分猖獗, 这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耻辱感、压迫感和宗教上的纷争, 都是单极体系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的原因, 美国在反恐的过程中也应该反省: 不同的文明必定会走向冲突吗?

张茜: 反恐对美国来说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伊斯兰国家的信念, 而他们就像打老鼠一样地追击恐怖分子的做法显然也不现实。

4. 挪威于特岛血案

7月22日, 挪威遭受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暴力袭击。一个名叫布雷维克的32岁男子将枪口对准了于特岛上的无辜普通民众。他的极端行为引起全世界对欧洲极右翼极端主义兴起的反思。



➤ 专家解读

布雷维克承认实施了暴行但拒绝认罪, 因为他的作案动机是希望给挪威社会(进而是全欧洲)带来“革命”。这绝非他个人的内心独白, 只要欧洲当前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 就会有别的组织或个人演出同样的悲剧。对于在全球化急速发展面前竞争力下降进而心态失衡的欧洲来说, 需要的一定不是布雷维克式的极右翼“革命”, 但的确需要一场触及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深刻变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 崔洪建

尽管当前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为极右翼势力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有相当数量的本土居民过于敏感, 沉湎于身份认同与传统文化消失的焦虑之中, 但这仅仅是挪威恐怖袭击的背景而已。从现实情景出发, 我们依然不能排除挪威恐怖袭击案的偶然成分。也就是说, 现实情景作为外因诱导了布雷维克的犯罪, 但构成恐怖袭击的核心要素依然是布雷维克本人, 归因于其独特个性与近乎扭曲的偏执性格。正是有了布雷维克这一突变基因, 才导致了挪威恐怖袭击人间惨剧的发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李广仓

➤ 学生视角

吕海: 这是挪威二战后遭到的规模最大的袭击, 也是战后欧洲大陆遭到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之一。这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之后欧洲的恐怖主义有抬头的趋向。欧洲各国, 特别是北欧国家, 在成为“福利国家”、解决了人民吃穿住行的物质需求之后, 怎样防止极端势力、恐

怖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精神上的危害，是一个新的议题。同时，这也再一次给世界人民敲响了警钟，告诫人们要严防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高警惕，为构建和谐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姜忆楠：挪威枪击事件说明非传统安全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联想起近来“大国无战争”的国际局势，国人应认真思考国际政治现阶段的关怀重点是否将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转向国内政治。

5. 美国掀起“占领华尔街”活动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解放广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不到三个星期里，星火燎原，演变成一个全美范围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

➤ 专家解读

虽然无论从运动的规模还是对制度的批判程度来看，目前的抗议活动都还不能同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但这次民众运动显示出，美国国内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已经露出端倪，而经济不振和军事挫折是矛盾激化的催化剂。这次运动的明显特点是，其矛头是针对金融组织的，示威群众认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使老百姓大受其害，并把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不满归咎于它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 周琪

美国兴起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很多观点认为，似乎这仅仅是美国民众又一次宣泄愤怒的抗议活动，仅仅是对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金融监管不力表示不满。其实，这次运动与以往的抗议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不是单纯争取某些经济利益，如社会福利、失业救济，也不是单纯寻求发泄对华尔街贪婪、腐败的愤怒情绪，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核心弊端：金钱操纵政治。美国历史上像这样提出深远政治改革目标的社会运动尚属首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杨斌

➤ 学生视角

陈磊：华尔街，代表了美国的金权政治，他们掌握着财富，控制着政治。轰动世界的大选，似乎只是华尔街左手换右手的游戏。他们操纵着政府频繁发动战争，为他们带来巨大利益，却使美国陷入经济困境。可以预知，美国的民主在被金权侵蚀，当侵蚀达到极限，华尔街的黑暗必将浮出水面。冲击华尔街，只是一个开端。

王学旺：占领华尔街运动，仍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根本动摇美国社会制度，但显示出以自由压倒平等的美国民主模式下，政府只是为美国社会上层服务。所谓的华尔街金融精英，如此贪婪与腐败，利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美国 1% 的人控制着 40% 的财富，美国是 1% 的“民有、民治、民享”；社会分配极端不公，导致机会的不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已是虚言。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的内部分权，是利益集团利益协调的工具，民众成了权力的受害者。美国需要将蛋糕分好，需要进行改革。

6. 欧洲债务危机

2011 年，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经济接近崩溃边缘，丑闻迭出却稳坐总理宝座的贝卢斯科尼最终败给了欧洲债务危机。和他具有相同命运的是“笨猪五国”的领导人，他们先后因债务危机而不得不下台。



► 专家解读

面对希腊等国的危机，欧盟和 IMF 给出的“处方”是“勒紧裤腰带”，大力紧缩政府开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除了在公共部门实施裁员、减薪或私有化以外，还要在全社会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税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三国要求纾困的时间各不相同，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意给予援助时都要求受援国压缩财政开支和增加财政收入。

然而，这种反危机措施的副作用不容小觑。在一定意义上，摆脱危机的有效手段和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实现经济复苏。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增加投资，扩大消费，推动出口。而欧盟和 IMF 的“处方”是“勒紧裤腰带”，这样的反危机措施显然不能造就实现经济复苏的“三驾马车”。

令人遗憾的是，“勒紧裤腰带”之类的反危机措施使希腊等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没有外部救助，这些国家难以走出困境；要得到这些救助，它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财政赤字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实施的紧缩导致经济增长毫无动力而言，社会冲突也愈益严重；经济得不到复苏，就只能继续依赖外部救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江时学

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的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会给欧元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使全球投资者对欧元的信心受挫，欧元大幅贬值。第二，规模庞大的避险资金将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乃至中国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全球投资者重新审视国家主权信用危机，加重了对其风险的担忧，从而使资金流向发生逆转，寻找美元或者美国国债等避风港。第三，欧元的大幅贬值将会影响欧元区国家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进而影响欧元区国家对外进口能力。在金融危机中，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均陷入衰退



之中，导致失业率和财政赤字的攀升，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也产生严重分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由于欧洲债务问题不断蔓延，且正逐渐演变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欧洲联合中存在的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内在矛盾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市场上出现了看空欧元的情绪，有人甚至认为欧元区将在未来不长时间内发生分裂和崩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黄河

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元区国家债务问题的主要外部诱因。一方面，在欧洲部分金融行业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金融资产在其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较大，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使其资产严重缩水。另一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各国普遍实施了扩大政府投资的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直接扩大了欧洲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埋下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谢世清

➤ 学生视角

王宝盆：众所周知，欧盟是世界区域化进程最快、最发达的地区，此次的欧元债务危机中，由于欧盟一直在不断扩大规模，在对希腊的经济援助上，各国意见不一致，让我们认识到了欧盟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达成共识，同时也要防止此次危机扩展，形成全球性危机。

杨雪：这是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应，其中蕴含着全球化崩溃的势头。欧洲在向第三世界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稳定金融资本。

郝丽君：尽管欧元债务危机不容忽视，全球化也会继续其前进的步伐。因为我们谁都无法抵制全球化巨大的利诱，也没有谁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全球化会有多大的潜力，没有国家愿意冒脱离国际社会的风险。我们只能合力把它向更好的方向建构。

7. 巴勒斯坦打开入联“突破口”

阿巴斯在 120 多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鼓舞下，不顾以色列与其强力靠山美国的强烈反对，9 月 23 日正式将申请书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他呼吁联合国，根据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 1967 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承认巴勒斯坦是独立国家并给予完整的联合国国籍。但此事料将前途坎坷，巴勒斯坦人要实现建国梦想仍困难重重。

➤ 专家解读

入联充其量只是象征性的东西，一个国家要成立得有一系列要素，比如说领土、主权、边界，而这些要素在巴勒斯坦实际上都不存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和平进程已经名存实亡多年了，2000 年以后离巴勒斯坦国是渐行渐远，到了奥巴马上台以后又接着要推进巴勒斯坦建国，但没有一点儿进展，甚至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以色列也没有停止扩建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所以到联合国去申请实属无奈之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绍先

巴勒斯坦积极加入 UNESCO, 不仅仅因为后者是联合国系统的组织, 更多的是为了“强迫”平时不愿对巴以问题公开表态的国家做出选择。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 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家不是少数。如果美国继续偏袒以色列, 有陷入国际孤立的危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联



➤ 学生视角

左锦涛: 从法理和情理上讲, 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提出建国的要求并无不妥; 但是从现实角度看, 巴勒斯坦建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可以这样说, 没有美国点头, 就不会有正式的巴勒斯坦国, 无论是通过入联还是别的什么方式。但是除了寄希望于大国, 巴勒斯坦现在应该做的, 是弥合内部分歧。毕竟,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内部的团结要比大国的支持更重要,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比联合国的“名分”更重要。

姚顺平: 巴勒斯坦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他们的建国历程是艰难的。以色列先于他们建国, 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但是巴勒斯坦却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希望巴勒斯坦能够尽快顺利建国, 完成民族的夙愿。

杨雪: 我是很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 这是他们人民的心声, 虽然道路很坎坷。希望西方大国不要过多干涉, 希望巴以加快推进谈判。

8. 德班世界气候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 11 月 28 日起在南非港口城市德班召开。各方在会议开幕式上呼吁坚持多边谈判原则, 进行建设性的谈判, 达成包容、平衡、公正、可信的结果, 让各国根据自身能力做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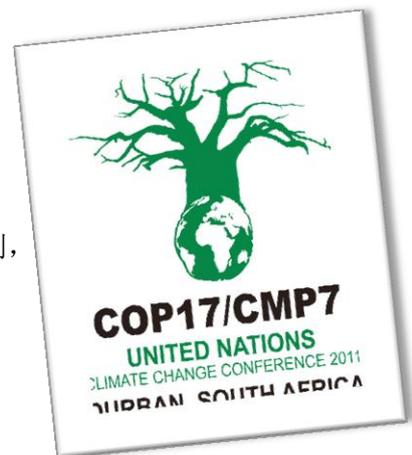
➤ 专家解读

德班会议不是世界末日, 也不是说气候变化问题就靠德班会议。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不是靠哥本哈根、坎昆或者德班会议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进程, 如果这个进程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 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 一步步往前走, 这本身就是进步, 就是进展, 这本身也是对德班会议取得一个积极成果的、抱有期望的最坚实基础。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 苏伟

对南非而言, 举办德班峰会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 可以展现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意愿, 展示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 (南非) 可以借此彰显自身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博士生 张伟杰





➤ 学生视角

于思佳: 在刚刚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上, 虽没有以往会议的尴尬收场, 取得一定进展并开启全球减排新协议谈判进程; 但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各执己见, 此次会议仍然不过是各方利益的妥协, 而在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方面前方未必坦途, 倘若继续, 那么何谈未来?

周正: 这又是一次玩笑, 这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延续, 继承了其失败的氛围。只要国家存在, 气候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郝敬伊: 本次气候大会, 资金是关键, 如果每个国家能自觉承担自己的责任, 提供“绿色资金”, 气候大会也就不再是徒有虚名了。

9.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

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纪念日。入世十年来, 中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对外贸易成长空间, 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道路, 完成了从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参与者到推动者的角色转变, 站在新高度的中国以自己的努力重塑了世界的关系。

➤ 专家解读

无论是金融产业、贸易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个人总的观点是, 一个行业越开放, 它就越发展, 也就越安全。唯有深化开放, 推进改革, 才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软肋和缺陷。

在继续开放的问题上要下大决心, 要重温中国当年在入世时的决断力。这也算是纪念入世十周年的一点收获吧。实际上, 我倒不赞成什么十周年、十五周年纪念。小平同志总是喜欢讲长期的事情, “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 我们喜欢五年十年就动一动、摇一摇, 好像每制定一个五年计划就产生一些新趋势。有些事情一以贯之把它做了就好了。还没做好, 又来了新计划、新目标, 怎么去实现?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龙永图

入世十年我国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市场机制在多数部门和行业的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由经济企业和行业的大量存在和发展是中国经济活跃的基础, 因而持续的市场化改革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前提。

——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 佟家栋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里程碑, 它既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也标志着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与法治在中国市场的确立与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盛斌

► 学生视角

曹芮: 不同利益集团站在各自立场对中国入世十周年发出种种感慨, 众说纷纭。当经济联系紧密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时, 为了防止陷入被孤立、边缘化的困境中国只能选择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 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应让位于经济自由主义。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我们倾尽全力挤进

的是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伴随着开放的进程同时, 欧美经济势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经济主权的捍卫岌岌可危。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楚河汉界般的严格对立, 如何运用中庸思想巧妙糅合两者, 这考验着精英阶层的哲学智慧。

廖帆: 中国入世十年为我国经济带来的收益与发展当然是不可磨灭的, 但经济效益背后, 是否该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漫画和好莱坞模式侵蚀着本土文化, 是否该看到外资涌入对民族工业的挤压呢? 希望入世十年不只是有欢呼与庆祝, 更应该有反省和进步!

肖文强: 中国入世带来了机遇, 但是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我主要说负面影响。首先入世之后, 中国大宗货物因为入世被国外垄断, 由此造成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 比如大宗农产品(如大豆等)现在不得不进口其他国家的农产品, 转基因食品也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另外我们没有很好利用中国市场十分巨大这个筹码, 在入世谈判时让步过多, 在入世后也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张培: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来, 入世带给我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吸引了更多外资来华投资, 激发了市场活力, 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扩大了中国的出口, 促进了自己的经济转型; 为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更为活跃的市场, 等等。

入世, 对中国来说, 不仅仅意味着好处, 也同样意味着危机。我们通过改革开放, 吸引外资, 促进了竞争, 这本是十分有利的, 加入世贸组织, 这种竞争机制更是加快了国有体制的改革。但是, 由于有些地方盲目单纯地想要加快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大量引进外资, 导致了众多本应由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企业落入外商手中, 民族企业受到重创。几年前的“洋水务”, 还有控制了世界 80% 粮食贸易的 ABCD 四大粮食家族, 他们正是借着世界贸易的顺风车, 垄断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他们跺一下脚, 世界也要抖三抖。

加入 WTO, 在取消大豆进口关税和配额制度之后, 我国已经从一个大豆出口国变成一个大豆进口国, 进口依存度超过 70%, 并且中国大豆加工产业的 80% 也是由外国人控制。以前生产化学药品的“孟山都”, 摇身一变, 已成为如假包换的农业公司, 中国进口的大豆中, 90% 以上采用的都是孟山都制造的转基因大豆。用这种价格低廉, 产油量高的转基因大豆, 美国粮食公司成功挤掉了我们东北本土的优质大豆, 这对民族企业无疑是当头一棒。不仅如此, 孟山都还在我国广西省以低廉的价格推广高产量玉米, 导致农民纷纷选择孟山都的



转基因种子。这种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危害对中国来说也许是灭顶之灾，而转基因食品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正是由于借着改革开放和加入 WTO 的东风。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经济无疑得到了巨大发展。开放和自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绝对趋势，但是，开放也必须要适度。入世，意味着降低关税以及各种非关税壁垒，这种条件，加快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并在政策的鼓励下，一步步控制着我国的民生产业。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再以高额的价格垄断，中国至关重要的产业就这样一步步脱离我们的控制。什么该开放，什么不该开放，希望我们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重新调整开放政策，不要单纯地为了眼前的 GDP，而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1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

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于 12 月 17 日上午 8 时 30 分，因疲劳过度，在列车上突然去世，享年 69 岁。据悉，朝鲜已宣布从 12 月 17 日至 29 日进行全国哀悼，金正日的葬礼将于 12 月 28 日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



➤ 专家解读

从朝鲜内部来看，现在需要集中精力把过渡时期社会稳定住，不会有更多新的举措。从韩美这方面来说，他们也不愿意见到再出现什么特别大的意外。对他们而言，实际上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政权更迭等等一些，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采取这种方式，会不会产生很多他们难以承受的后果，他们在矛盾心态

之中。中国、俄罗斯的表态，中国、俄罗斯都强调跟朝鲜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表示对朝鲜继续发展双边合作关系的坚定的信心，再加上金正日委员长和周围的班子，对新的领导人的肯定、认可，局势的稳定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曲星

金正日突然去世确实会使国际社会担心朝鲜国内的局势以及朝鲜半岛的形势发展，但实际上，金正日在去世之前已经把未来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整个朝鲜不会发生什么剧烈的动荡。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刘江永

➤ 学生视角

项鲁恩：金正日的逝世，对于北朝鲜国家内部的政局稳定以及国家的不断发展造成压力，同时（逝世之后）这段时期也是考验下一代领导人能力的关键时期，可能是朝鲜半岛局势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东北亚的几个重要国家将更深地卷入到朝鲜问题中，而朝鲜与西方世界



的关系将可能变得更为不确定和脆弱。

赵姝婧：看见的，看不见了。夏风轻轻吹过，在瞬间消失无踪，记住的，以往了。只留下一地微微晃动的迷离树影……关于朝鲜局势的走向尚不明朗，以下是我的愚见：

1.朝鲜国内：接班人金正恩是否能顺利接过他父亲的接力棒，有力地掌控局势未知。由于其年轻，资历不够，又是近一年多来才出现在朝鲜民众视野，他在军队和人民心中的位置是肯定不及他父亲当年刚接任的时候，尤其是军队元老级人物，可能会心存不服。不过在朝鲜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国家，民众对金日成、金正日的确是非常尊敬的，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至少能接受其领导（何况已经出现对金正恩的个人崇拜了）。

2.朝鲜与中国、俄罗斯：至少短期内会继续保持原先的关系。毕竟一个新扶植的年轻领袖在国内威望还没完全树立起来的时候还是非常需要“老大哥”的帮助的。至少会给予其很大的经济支持。另外，中国是非常乐意看到朝鲜主动进行经济改革的。

3.朝鲜与美日韩：短期内不会有很大冲突，朝鲜方面会保持克制，毕竟金正恩不会在位子还没坐稳的时候贸然挑起祸端，即便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也不会贸然冒险的。所以，总的说来，我认为，朝鲜半岛的局势短期内是较为和平的。

张晓康：金正日之死对东北亚局势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儿子接班很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稳定。首先是朝鲜国内局势能否保证稳定，作为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没有军功，年纪也很小，怎么服众是一个问题。其次是金正恩如何解决朝鲜改革过程中的经济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很可能引发民众不满，高层中对金正恩不满的人很可能趁机发动叛变。另外，金正恩上台之后，很可能把矛头指向韩国，用以转移国内矛盾，甚至引发核危机或者战争的危险。美国、韩国、日本甚至俄罗斯都有可能插手，由于朝鲜离中国很近，朝鲜问题很可能给中国造成不利影响。

[整理：江育恒、曹滢、吕海、张晓康、郝丽君]

[责任编辑：田光强]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知识体系 (2001-2010) *

30 多年前,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斯坦利·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 断言, 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学科”, 无论是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等方面, 它都深深地烙下了“美国霸权”的印记。如今, 随着学界对“美国衰落”的讨论再次兴起, 在国际关系研究这一领域, 美国的“知识霸权”地位是否也如其国力一样开始下滑, 辉煌难续呢? 最近,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刘丰博士组织的研究团队对《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杂志》《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世界政治》《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和平研究》《国际互动》等 9 种顶级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主流期刊 2001-2010 年发表的所有研究型论文进行了编码和数据分析, 为我们系统展示了近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体系图谱。

国际安全议题是西方学界关注焦点

权贤美

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一是研究主题的范围以及研究该主题使用的方法; 二是生产知识的学者的范围和属性。我们对 2001-2010 年 3 种政治学顶级期刊和 6 种国际关系顶级期刊发表的 3190 篇论文 (其中国际关系类论文 1587 篇) 进行了“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由于我们采用定量方法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关注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而不是自变量本身, 自变量只是理解议题的途径与手段, 因此我们将 1587 篇国际关系类论文的研究主题根据研究的因变量或关注的焦点细分成研究领域 (issue) 和研究议题 (topic)。例如, 将研究领域分为“国际安全与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和“民主与发展”等 16 大类; 而在研究议题中, 类别划分更为细致, 如“国际安全与冲突”中包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军备控制、恐怖主义、国家间战争、国际危机等子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包括贸易、经济相互依存、货币政策、对外援助与贷款等, 共计 30 种。

通过对 9 种期刊发表论文的“扫描”, 我们发现“国际安全与冲突”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两大主要领域, 论文比重分别占到 39% 和 15%, 而频率最高的研究议题依次是国内战争、国际危机和国家间战争, 分别占 11%、9% 和 8%, 加上如联盟、均势等属于国际安全与冲突的相关子议题后, 比例总计达 40%。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类细而多, 单个议题分类的比重较小, 但是将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子议题比例加总后, 比例也达到了 15%。据此看来, 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仍是学者们主要的研究方向, 尤以国际安全为重。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研究意义就在于对战争与和平这一永恒的、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终极主题提供理解与解决之道, 尽管在全球化浪潮中, 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 更多的全球性议题如气候问题、能源问题等成为时下热门议题, 但是诸如怎样保

* 作者简介: 权贤美, 女,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国际政治专业 2009 级本科生; 任娟, 女,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国际政治专业 2009 级本科生; 李金潼,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国际关系专业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董柞壮,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国际政治专业 2009 级本科生。

作者在此感谢刘丰、陈冲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 文责自负。本文所用数据的录入工作由陈冲、李金潼、孙迪、董柞壮、任娟、权贤美、姜忆楠、王芳琳、吕海完成。



障主权国家或种族的安全等危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这是国际安全仍成为国际关系学科最主要的研究方向的原因。

从最近十年每种议题的发文数量变化趋势来看,“国际安全与冲突”从2001年开始稳步上升,2006年到达最高值,随后有所下降,到2009年再次上升;“国际政治经济学”变化平稳,从2001年至2005年呈微弱下降趋势,之后开始上升;“国际关系理论”、“对外政策分析”、“方法论”和“民主与发展”等议题的发文数量基本平稳。在研究议题之中,国家间战争、国内战争和国际危机波动上升,十年内国内战争和国际危机比重分别达到11%和9%,国际贸易和经济相互依赖议题变化稳定。以上数据结果表明,安全仍是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领域,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其他因应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新议题(如人权、环境等)也逐渐进入学者关注的领域之中。

从各个期刊对研究领域的选择角度来看,除《国际组织》杂志上“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以34%的比例领先“国际安全与冲突”议题20%的比例外,其他杂质均是国际安全研究多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在《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杂志》和《国际互动》等杂志上,安全领域的研究比例也分别高达44%、34%和51%。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重镇”,国际安全与冲突则是其他各大期刊最主要的议题。

定量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

任娟

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案例研究)、形式模型、实验方法、描述性方法和政策分析等。通过对9种期刊的发表文章所有方法的统计,我们发现定量研究占大多数,有52%的文章使用了该方法。其中,《美国政治科学》发表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国际关系论文比重最大,达到了62%。除此之外,《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国际互动》《国际研究季刊》《政治学杂志》《和平研究》和《世界政治》等期刊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也超过半数。值得注意的是,9种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的比例都在稳步上升。

仅次于定量研究的是以博弈论为主的形式理论,在所有方法中占15%。尽管博弈论应用的时间比较晚,但过去十年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其中《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有33%的文章运用了形式模型方法,居9种期刊之首。使用描述性方法的文章与形式模型方法的文章比例类似,占13%。其中,《美国政治学评论》《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和《国际研究季刊》均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文章运用该方法。描述性方法不像形式理论那样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而是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在2005年达到最高。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论文所占比例为11%,《世界政治》是该方法使用率最高的期刊,达31%。实验方法和政策分析在9种期刊中均有涉及,不过比重很低。

分期刊统计,在《美国政治科学》上,十年来定量研究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基本在60%上下波动,而该杂志中形式模型和定性研究等方法使用率一直不高。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形式模型的使用率不相上下,近两年定量研究的上升趋势明显,而描述性方法的使用呈现下降趋势。《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定量研究



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且幅度很大,远远超过了之前使用最多的描述性方法。《国际互动》这本期刊的方法也以定量研究为主并且使用率逐渐上升,形式模型的使用率在 10%到 20%之间浮动。《国际组织》也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定性研究、描述性方法和形式模型这三种方法的使用率十年来略有波动,不过总体上它们的使用率相差不大。《国际研究季刊》和《和平研究》两本期刊的特点相同,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不仅超过半数,而且仍在逐年上升,定性研究和描述性方法的使用则比重相当,十年中稍有起伏。《政治学杂志》的突出特点是形式模型的使用率有明显上升,而描述性方法的使用率不断降低。《世界政治》杂志的论文主要由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类构成,定量研究所占比重达 60%以上,形式模型等其他方法的文章只是偶尔出现。

总的来说,我们统计的 9 种期刊十年来的一个趋势是定量研究的使用比重不断上升,并且很多期刊过半数的文章都使用这一方法,这反映出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方法逐步走向量化的趋势。同时,近十年来形式模型的使用量也在逐渐增加,尤其是博弈论的运用比重明显增多。定性研究和描述性方法虽然相对于定量研究和形式模型来说不那么受欢迎,但是它们仍有一席之地。从统计的结果中不难看出,定量研究这种方法越来越受人青睐。不过,定性研究、形式模型和描述性方法等的存在也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研究。

中青年学者是知识生产的主体

李金潼

任何学科知识的进步或增长都是基于“人”的推动。那么,哪些人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研究型论文呢?鉴于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许多文章存在联合署名的情况(大约 50%),在统计中我们主要关注文章第一作者的“性别”、“职称”两个属性的差异,希望为国际关系研究者展示一幅丰富而详尽的西方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群体图景。

就“性别”而言,在发表国际关系类论文的 3 种政治学综合类期刊中,男性学者人数十年来呈先降后升的趋势,总体上高于 60%,而女性学者人数则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最高曾达到 33%。女性学者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和《美国政治科学》发表的国际关系文章中占到四分之一,而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同类文章中所占比例不到 8%;在 6 种国际关系期刊中,十年来男性学者发表原创研究除 2006 年有所下降外,均稳定在 60%及以上的水平,女性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比例除 2006 年超过 50%外,其余均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平,这与 3 种政治学类期刊的趋势基本一致。总之,在国际关系知识创新及增长中,虽然女性学者的贡献有所提升,但男性学者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第一作者的“职称”角度看,在政治学类期刊中,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的讲师或助理教授数量最多,基本保持在 25%或以上,但最近几年略有下降。2002 年以后副教授发表文章的比例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除 2004 年外,教授在政治学期刊上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的比例相对不高,然而他们占据了《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国际关系文章的三分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关系教授仍把《美国政治学评论》作为发表自己原创研究的权威杂志。此外,纵观政治学类期刊,研究生或博士生发表的国际关系主题文章极少;在国际关系期刊中,

十年来讲师发表论文的比例高于教授,基本维持在40%及以上的水平,而教授发表文章的比例高于副教授。不过,在统计的国际关系期刊中,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数量每年都有10%左右,而《和平研究》为青年人交流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创新仍以年轻学者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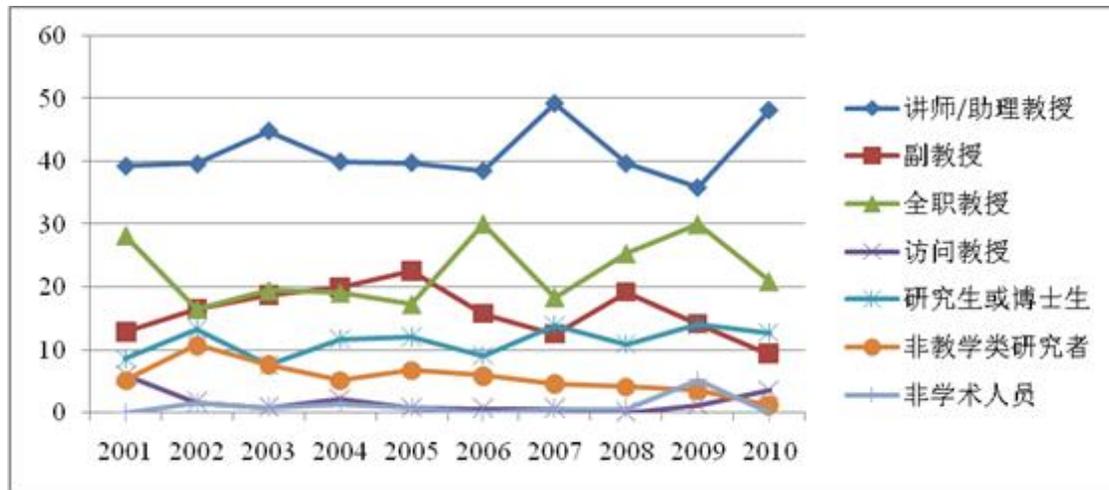


图1 国际关系类期刊第一作者职称分布趋势图
(来源:作者自制)

结合“性别”与“职称”变量,在3种政治学类期刊中,男性讲师与女性讲师的比例都占了将近一半,而讲师、副教授、教授的发文章数量男女差异不大,这表明在政治学类期刊上发表国际关系文章没有明显的性别或职称差异。另一方面,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男性教授和女性教授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政治学综合杂志,这说明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国际关系文章具有一定难度;而在国际关系期刊中,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及研究生或博士生贡献的国际关系原创成果中,男性学者人数比例几乎是女性学者的1.5-2.5倍,这一发现表明在国际关系顶级期刊中,存在较大的性别和职称差异。

“美国学科”色彩仍然浓厚

董柞壮

在考察了这十年来主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期刊论文的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之后,我们结合知识生产者所在来自的国别或地区来回答“国际关系是否仍然是一门美国学科”这一问题。为此,我们根据埃尔塞尔·埃蒂莉(Ersel Aydinli)和朱莉·马修斯(Julie Mathews)的划分,将这些研究者所在的国别地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核心国家”即美国;第二类是“核心外围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德国、以色列、爱尔兰、意大利、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第三类“外围核心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匈牙利、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土耳其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三种分类中,核心国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总数的84%,第二类和第三类分别占14%和2%。

首先,就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而言,在核心国家的文章中,定量方法的文章占53%,使用形式模型的文章占16%,使用描述性方法的文章占13%,使用定性方法的文章占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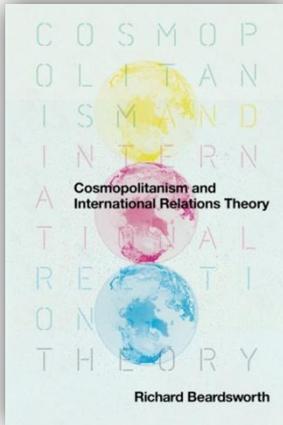


《新视界》稿件转投发表统计

期数	栏目	作者	原题目	转投发表情况
总第 1 期	书山有路	刘若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展与困境 ——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	《国际政治科学》 2010 年第 2 期
	书山有路	高婉妮	国际政治的等级状态？ ——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国际政治科学》 2010 年第 1 期
总第 2 期	书山有路	杨小龙	再谈“北约”何以存在	《政治科学季评》(台湾) 2010 年第 4 期
	书山有路	陈永	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行为逻辑	《政治科学季评》(台湾) 2011 年第 4 期
	学术讲堂	蒲晓宇	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 年 1 月 21 日
总第 3 期	学人访谈	张睿壮	为民族主义正名 ——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张睿壮教授	《看世界》 2010 年第 12 期
	书山有路	常璐璐	权力、认同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评《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国际政治科学》 2011 年第 1 期
	他山之石	陈冲、刘丰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一）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 年第 5 期
总第 4 期	学术论文	康晓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兼论中国对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可能贡献	《外交评论》 2011 年第 2 期
	书山有路	左超	制度现实主义与制度制衡 ——评《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经济相互依赖与中国崛起》	《国际政治科学》 2010 年第 4 期
	他山之石	陈冲、刘丰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二）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 年第 5 期
总第 5 期	书山有路	邓子立	精神世界的回归？ ——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	《国际政治科学》 2011 年第 2 期
		陈冲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 ——评《国家的网络》	《国际政治研究》 (已接受发表)
	他山之石	马丁·史密斯、姜忆楠	如何发表政治学类评论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 年 8 月 18 日
总第 8 期	年终特辑	权贤美、任娟、李金潼、董柞壮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知识体系（2001-2010）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责任编辑：田光强]

新书架(四)



理查德·伯尔德斯沃斯:《世界大同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剑桥:政体出版社,2011年。(Richard Beardsworth: *Cosmopolita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1.)

最近有关全球化的争议不断,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同主义。然而,除了规范理论以外,国际关系学科并不重视世界大同主义思想。本书将弥补这一空白,开展一场世界大同主义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对话。这场对话将围绕国际关系非普世理论与当代世界大同主义思想之间的三大争论展开。本书选择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现实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三者都批判国际关系领域的自由主义理论,世界大同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分支。鉴于各学派对普世主义所持有的批判,本书认为了解当代政治中的世界大同主义视角既重要又困难。伯尔德斯沃斯强调国家层面的全球领导需求、世界经济的再深入、更少暴力的世界政治以及世界政治判断。他同时建议将更多的议题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当代世界大同主义之中。本书将吸引所有政治理论以及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希望厘清世界大同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批判者间主要议题的学生。



斯图尔特·施尔德斯、伊恩·布拉夫、胡沃·马卡塔尼编:《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11年。(Stuart Shields, Ian Bruff and Huw Macartney, ed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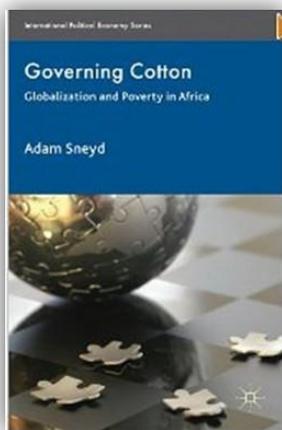
在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及最近的方法论与理论分歧的争论中,本书作者们认为需要对“批判性”的概念再进行审视。他们对所谓的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评估并质疑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否已挖掘其潜力。这种挑战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但其有共同的关注:重新评估批判性路径的目的以及反思为何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得到重视而另一些却被忽视。鉴于最近国际经济政治学科内的有关“跨大西洋分歧”这一概念的争论,本书将说明批判性与传统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批判性是否会适应更大规模、更本质性的批判性社会调查以及这样的调查意味着什么。



劳拉·霍恩：《欧盟的公司规范治理：向企业控制的市场化迈进》，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11年。

(Laura Horn: *Regulat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EU: Towards a Marketiz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在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公司治理和监管失败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谁以及为什么由其控制现代公司，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定义之一。欧盟的公司治理条例填补了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空白，并且凸显了欧盟公司治理的政治性质。劳拉·霍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其着重关注政治斗争以及公司法和公司治理条例的新自由主义转变过程。她关于企业控制市场化的发现是更好地理解欧盟资本主义转型大背景的核心。在本书中，霍恩在欧盟层面上考察了公司法以及公司治理在形成和转变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政治、权力和矛盾等。通过在广阔的金融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将民族国家和欧盟监管政治连接起来，作者将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排除了效率和“自由”市场的因素，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权力作为公司治理改革的目标和推动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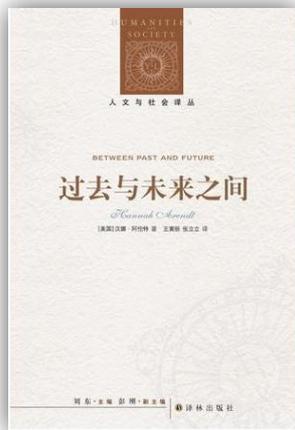
亚当·斯尼德：《治理棉花：非洲的全球化与贫困》，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11年。(Adam Sneyd: *Governing Cotton: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Afric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本书梳理了历史上棉花生产、国际棉花贸易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贫穷之间的关系，并评估了该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和非政府政策宣传的各种方法。目前全世界数以千计的人们正在努力使非洲棉花能够对几百万种植者和依赖者更有利。本书梳理了棉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间的历史关系，评估了该地区明显的新社会关注的各个方面。它采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验方法，将全球化使贫困减少和非洲棉花农场依旧贫困的方式具体化了。斯尼德认为，当棉花种植和贫困能够在未来被联系在一起时，那么今天的这些问题在未来就有希望得到解决。本书提供了对棉花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时代非洲贫困之间的关联周密而平衡的评估。书中提出对新治理措施的讨论，如细致而又极具吸引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措施。



[意]马里奥·泰洛：《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潘忠岐、简军波、张晓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本书是一位欧洲学者从欧洲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欧洲的起源，国际关系体系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兴起，现实主义、激进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纷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外交决策，主权观念的历史演进，以及欧洲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贡献等方面。作者强调，“欧洲视角”决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欧洲是国际关系新理念的实验室”，“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一场真正革命和一个主要挑战”，但没有理由因此把欧洲看作是后现代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后国家中心主义的，并与非欧洲世界对立起来。主权的汇集和共享并不构成主权的终结，不意味着一个后政府或后民族国家实体在欧洲出现，也不意味着帝国的或世界性的欧洲超级大国正在形成，更不意味着要以琐碎的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将这些趋势推广到全球。



[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阿伦特的笔下勾勒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危机：政治学中诸如正义、理性、责任、德性、荣誉等传统关键词的意义失落，及其带来的后果。通过八篇随笔，她再一次提炼出传统概念中至关重要的精华，以此来评估我们现代人当前所处的位置，重新获致观照未来的框架。《过去与未来之间》是阿伦特最为重要的作品。对于感到现实摇晃、动荡的人们，遭遇没有安全感的现代社会，这本书将带来最贴心、最富启发性的反思。比起《论革命》，《过去与未来之间》和中国读者的语境、感受，有多得多的重叠。这本随笔集洞悉我们时代的政治困境和文化困惑，阿伦特以其最深沉而动人的笔触、迫切又独特的情怀，阐释了政治学的经典意蕴。

（田光强 董柞壮 供稿）

[责任编辑：袁婷]

♣学术交流♣

名刊主编畅谈科研能力的提升与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

(转自南开新闻网) 11月12日晚,“走近中国名刊”系列讲座举行“科研能力的提升与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专场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范勇鹏、《现代国际关系》主编林利民和《外交评论》主编陈志瑞应邀做主讲嘉宾,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三位主编结合各自期刊的定位、特点、发展方向等内容,阐述了如何提高研究能力,撰写高水平学术论文等问题。



范勇鹏结合自身经验指出,高水平学术论文应具备以下要素:观点明确的标题、准确点明文章所涉及领域和问题的关键词、规范的摘要、能明确提出问题的正文、专门

的方法论或理论说明等等。同时他强调,所投文章格式规范、版式整洁,投稿时作者向编辑点明文章亮点的简短自述,作者对文章风格与所投期刊定位一致性的准确把握等都有助于论文的成功发表。

林利民谈到,《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的特点在于其对国际关系相关领域问题的动态性、前瞻性、战略性、政策性、理论性等方面的把握,这五点合力保证了杂志定位的前沿性,即旨在引导和推动将理论简化,用以指导现实问题。他借用丰富有趣的实例,阐释了理论与问题的关系。他还从多个层面对学术论文写作提出建议:选题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突出重点;写作要有问题意识,用观点带材料,注重行文逻辑的连贯性;应尽可能选用第一手、权威性的资料,慎用网络消息;遵守写作规范等。他反复强调,投稿要注意所投期刊的特点,符合所投刊物的定位。

陈志瑞简要分析了国际政治类刊物现状及《外交评论》的特色,而后探讨了如何撰写学术论文。他认为,好的论文需要透过现象发现问题、重视反常识的思考,同时还要有顺达的逻辑和紧凑的内在结构。在谈及学生发表论文的问题时,他鼓励学生多练习写作,熟悉不同风格,注重积累,踏实做好论文,不要过于急切。

三位嘉宾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在回答师生关于“大学生和年轻学者是否也有机会在这些著名杂志中发表文章”的问题时,主编们认为:“文章的发表与否并不在于其他,只要文章质量好,我们眼中没有‘大腕’。”引起了在场师生的强烈反响。讲座主持人吴志成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精要点评与总结,鼓励到场师生扎实做学问、不断提升学术能力和写作水平。

“走近中国名刊”系列讲座是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的品牌学术活动之一，自 2006 年创办至今，已累计邀请到近 30 位名刊主编做主讲嘉宾。本期活动邀请的期刊均为学术界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 CSSCI 期刊。其中，《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现代国际关系》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国家级综合学术期刊，长期被列为中文核心期刊，位于政治学类期刊前列。《外交评论》由外交学院主办，为外交专业国内顶级刊物之一。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博士生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董柞壮）2011 年 11 月 19 日，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办、《新视界》编辑部承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校的约 20 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韩召颖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天津师范大学王新龙、南开大学杨雷、刘丰、黄海涛等老师到场点评。

会议围绕“国际关系：历史、理论与方法交融”、“地区与国别研究前沿”、“中国外交政策前沿研究”三个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者就大国无战争条件下大国之间的互动方式、



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选择的挑战、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状与方法、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联盟战略选择、日本对非洲政府发展援助的决定因素、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对中国外交的启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此外，与会者认为，青年人在知识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青年学者应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加强交流，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和中国外交的发展贡献知识和力量。

据悉，本次研讨会还吸引了来自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研究院、外国语学院等相关院系的同学参加，大家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加强了兄弟院校及师生之间的交流，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

我系师生出席清华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2011)”研讨会

(通讯员：陈冲) 2011年12月10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主办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2011)”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环球时报》的十余位青年学者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创新的总体评估”、“中国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的前沿领域”三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吸引了来自北京部分高校的40余名研究生旁听。我系刘丰老师和陈冲同学应邀参加并分别做了题为“国内学界关于联盟政治的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数据库建设：进展与趋势”的主题发言。

刘丰老师在主题发言中，回顾了近年来学界对联盟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并提出联盟具体组织形态的变化、如何瓦解对手的联盟以及中国古代联盟政治的研究这三个议题将是中国学者在联盟理论方面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陈冲则回顾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强调了数据库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对中国数据库的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会议的最后，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是一项寂寞清苦的事业，希望有至于从事这项事业的青年学生树立起对学术的信仰，热爱学术，不为眼前的名利所诱。此次会议回顾和讨论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许多重要的议题，加强了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将会对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师生活动♣

吴志成教授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转自南开新闻网)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文件,公布2011年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名单。我校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志成入选。

根据《关于2011年推荐选拔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的通知》(中宣办发〔2011〕10号),经各地区各部门推荐、专家评议、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社会公示,中宣部部务会议研究,确定2011年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共117名,其中理论界25人,新闻界34人,文艺界45人,出版界13人。我校吴志成教授入选理论界人才名单,为天津市唯一入选者。

“四个一批”是全国宣传文化系统人才培养的龙头工程。根据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结合宣传文化工作和人才队伍实际,2003年8月,中宣部会同中组部、人事部下发了《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作意见》。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造就一批全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精湛的作家、艺术家。为更好地适应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又相继将宣传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和专门技术人才纳入“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整个工程拟用5到10年时间,选拔培养1300名高层次人才,其中理论界200名,新闻界300名,出版界100名,文艺界400名,经营管理和专门技术人才300名。

南开学子参加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外交外事礼仪大赛

(通讯员:江育恒)2011年11月6日,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暨外交外事礼仪大赛十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来自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31所高校代表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本科生汪佳、权贤美、高翔宇、江育恒代表南开大学参加了本次大赛。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外交外事礼仪大赛以“青年的使命”为主题,侧重外交、外事、礼仪知识的考查。决赛分为“礼仪的颜色——必答热身赛”、“青年的声音——危机处理”、“外交的风采——情景表演”三个环节,内容涉及外交外事礼仪原则、礼仪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知识。最终,外交学院代表队在31所高校中胜出,夺得大



赛冠军。南开大学代表队名列第八名，并荣获“优秀礼仪团队奖”。

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表示，十年来，大赛的主题与时俱进，忠实地践行了“普及外交外事礼仪知识，提高大学生内在素质，弘扬中华文明风尚和促进国际交往”的社会责任。此次大赛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新，使青年学子更好地了解了当前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外交新观念和礼仪新知识。

始于2002年全国大学生外交外事礼仪大赛，在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和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举办，旨在传播涉外礼仪知识，鼓励中国人以更文明的形象拥抱世界。大赛自举办以来，以礼仪为核心，以涉外礼仪为主要内容，对提高大学生民族礼仪素养，拓展公众国际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视界》编辑部全体会议在范孙楼举行

(通讯员: 龚秀娟 摄影: 吕海) 2011年11月19日晚,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第四届编辑部大会在范孙楼116会议室顺利举行, 会议由《新视界》主编陈冲主持。编辑部全体成员及部分关心《新视界》成长的读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总结2011年秋季号的编辑工作, 大家指出了纸质版中文字、格式、排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致认为做好编辑工作需要端正态度, 互相提点, 力求完美, 并决定在下一



期减少失误。接着, 编辑部对冬季号的栏目与分工进行了讨论。

随后, 会议进入编辑部换届选举环节。经过匿名投票, 差额选举产生了新任主编、副主编。在新任主编的主持下, 每位编辑部成员对自己未来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说明, 也对《新视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同意以刊物为平台, 进一步扩大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争取为广大国关学生打开“新的视界”。

最后, 会议初步讨论了“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的筹备工作, 与会者纷纷表示希望这次论坛能突出南开特色, 形式上有所创新, 同时希望届时能得到南开大学有关单位及广大兄弟院校的积极支持。

2009级国际政治团支部举办模拟外交风采大赛

(通讯员: 江育恒) 为了响应校团委的号召、配合班级“五四评优”活动的开展, 2011年11月27日, 2009级国际政治团支部在范孙楼440会议室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模拟外交风采大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黄海涛、刘兴华、杨娜和团委刘小茵老师作为评委嘉宾出席本次活动。比赛分为开场秀与必答题、主旨新闻发布与答记者问、危机应对三



个环节。六位来自 2010 级国际政治专业的选手个个才思敏捷，语言流畅。出场秀环节展现了各位选手的才华，将新一代大学生的生机与活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在模拟新闻发言人过程中，选手们的发言时而严谨求实，时而妙趣横生，与现场“记者”的互动更是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危机应对环节，各选手根据大赛组委会设计的危机状况，现场做出新闻发言应对突发难题。整场比赛下来，选手们发挥出色，临场应变力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比赛任务，得到了现场评委老师们的肯定与赞扬。经过激烈的角逐，吕海同学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比赛冠军。曹滢和谷天一分列第二、三名。

南开大学 2009 级国际政治专业团支部已建立两年有余。本次比赛为广大学生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竞争和交流平台，锻炼了同学们的表达能力和应变技巧，鼓励了大学生对时事积极关注与思考，同时还丰富了同学们的专业知识。

南开学子喜获第六届全国高校模拟新闻发言人大赛三等奖

（通讯员：吕海）2011 年 12 月 14 日晚，由外交学院主办、外交学院广播站承办的“第六届全国高校模拟新闻发言人大赛”在北京外交学院主楼礼堂举行。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外交专业硕士生赵圆圆和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吕海组成的南开大学代表队，在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九所全国知名高校激烈的角逐中，获得三等奖的佳绩。

比赛分开场秀与必答题、主旨新闻发布与答记者问、危机应对三个环节。十所高校的选手都是有备而来，开场秀各具特色，主旨新闻发布滴水不漏，答记者问妙语连珠，危机应对淡定自若。南开学子赵圆圆和吕海的开场白中用改编版的“五项原则”弘扬总理精神，展现南开风采；随后赵圆圆顺利答对时政新闻题和国际常识题，为南开代表队开了个好头。在第二环节的比赛中吕海以 Y 市新闻发言人身份，就 Y 市发生的矿难进行主旨新闻发布，并接受学生记者的现场提问。最后一个环节中，针对主办方设定的危机，赵圆圆临危不乱，坚定地阐明了本方的立场。整场比赛下来，南开选手发挥出色，临场应变力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规定的比赛任务，得到了来自外交部、广电总局新闻司等部门领导的赞扬与肯定。最终南开大学代表队总分在十所参赛高校中位列第五，荣获三等奖。

从 11 月下旬接到参赛邀请那天起，两位同学就开始进行紧张的赛前准备——根据最新的比赛规则研究往年试题，收集时政新闻，了解新闻发言人制度，排练开场秀环节等。在最后的比赛中，虽然由于经验不足在某些环节有些紧张，但两位选手的表现总体良好，展现了南开学子的青春风采，为南开大学和政府学院赢得了荣誉。选手们将及时总结参赛经验，争取在下一届全国高校模拟新闻发言人大赛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新视界》杂志首次“读编交流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 张晓康、徐芳宇 摄影: 张晓康) 12月15日晚,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首次“读编交流会”于迎水道校区主楼208教室顺利举行。本次交流会主要针对2011级本科生读者, 围绕本刊发展、本系学术前景、个人未来发展等主题。交流会旨在增进低年级读者对我刊的了解, 为其大学生涯规划提供建议; 同时以刊物为载体, 搭建起本系各年级交流的平台。

在“经验分享”环节, 几位来自不同年级的主讲人从学习、科研、生活等不同方面, 各有侧重地分享了其在大学不同阶段的经历与体会。

《新视界》前任主编、2010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陈冲结合自身经历与涉略, 简要介绍了国关学科前沿发展现状; 同时结合自身体会介绍了几位代表性知名学者, 为低年级同学生动地勾勒出部分国关学界大师的形象。现任主编、2011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李金潼着重回顾了自己在本科高年级阶段的学习心得。他认为, 在找到自身兴趣点、不断明确自身目标的基础上, 须专心致志, 克服懒惰与急躁, 才能不断朝着理想扎实迈进。2010级本科生王芳琳则侧重强

调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并分享了大学资源拓宽视野; 她谈到的国请专业信息收集也

给到场同学很大启发。而在随后的环节, 主讲人与到计划、时间管理等话



场同学们就学习题进一步深入交流, 气氛更热烈活跃。很多低年级同学感触颇深: “学长学姐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建议, 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别样的大学图景, 对我们个人选择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此次交流搭建起了国际关系系高、低年级之间, 《新视界》杂志编者、读者之间的桥梁; 《新视界》编辑部也将结合本次交流会的成功经验, 在今后定期开展针对不同年级、形式更为丰富多样的交流互动活动。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批评指正; 也诚挚欢迎志同道合的同学加入编辑部, 为《新视界》的发展壮大提供助力。

[责任编辑: 龚秀娟 江育恒]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1年10月—2011年12月)

1. 吴志成、杨娜:《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整体上仍然处于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地位,但在和平、安全、区域认同、福利国家模式等研究领域,已经发展出具有本区域鲜明特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并为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做出了贡献。当然,北欧地区国际关系研究也存在自身的不足,理论基础薄弱与学术规模偏小的现实造成了其学科发展的局限性。

关键词: 北欧国际关系; 和平研究; 哥本哈根学派; 北欧认同

作者简介: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一体化、欧洲政治等研究;杨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主要从事欧盟、欧洲一体化等研究。

2. 吴志成、狄英娜:《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内容摘要: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次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关键词: 欧盟; 绿色外交; 环境外交; 决策机制; 多层次治理

作者简介: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一体化、欧洲政治等研究;狄英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外交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

3. 赵龙跃:《如何看待新出现的“美国衰退论”?——展望中长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载《对外经贸实务》2011年第9期。

导言: 最近几年在美国国内出现了新一轮的美国衰退论,争论还很激烈。有人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一种必然现象,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面临着由强盛到衰落的过程;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而且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只是一个暂时的经济困境。实际上所有关注美国衰退问题的美国专家,并不是真正认为美国在衰退,而是担心美国会出现衰退,更担心被中国超越,



然而我们国内有一些人却相信美国开始衰退。如何看待美国的衰退,对于我们研究制定正确的对美行动方案,对我们的外交战略决策至关重要。

关键词: 美国衰退论; 中美经贸关系; 趋势展望

作者简介: 赵龙跃,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经贸关系、经济全球化管理、WTO 与国际贸易谈判、中美经贸关系等研究。

4.徐振伟:《一战后美国对中东欧的粮食外交》,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内容摘要: 一战后,美国在赫伯特·胡佛的领导下通过美国粮食署对中东欧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粮食外交,其针对的对象不仅包括战败国德国,也包括东欧新独立国家。美国推行的粮食外交一方面出于维护其在欧洲利益的需要,使欧洲建立代议制民主政体,从而抵制苏俄社会主义的影响和渗透,另一方面也出于经济和人道主义的考虑,美国的粮食外交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美国; 德国; 东欧; 粮食外交

作者简介: 徐振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等研究。

5.杨雷:《俄韩油气合作迟滞的原因分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9期。

内容摘要: 俄韩油气合作自1990年双边建交起,至今举步维艰。俄韩两国在科维克金天然气项目和萨哈林项目油气上的合作是两国油气合作的重点,目前科维克金管道天然气项目陷入停滞,俄韩天然气合作的气源只有萨哈林岛,但液化天然气海路运输的数量有限,穿越朝鲜境内的陆路管道很难开建。除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外,俄韩油气合作还受到俄罗斯对东北亚地区能源外交思维,东北亚地区能源供需结构,远东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匮乏、投资环境较差,韩国企业对俄投资谨慎等因素的制约。尽管俄韩油气合作在短期内进展迟滞,但从长期来看前景广阔,俄韩油气合作对中国的影响利弊共存。

关键词: 俄罗斯; 韩国; 油气合作; 科维克金; 萨哈林; 天然气项目

作者简介: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俄罗斯中亚社会政治发展、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等研究。

6.杨雷:《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引起的反响及对策》,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第11期。

导言: 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还拥有雄厚的水电资源潜力。中亚地区更是便捷的陆上“东西走廊”,利于亚欧之间的交往。凭借这些优势,中亚地区吸引着世界大国的眼球。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与中亚五国全面发展关系。凭借地缘和经济优



势, 中国在与中亚五国发展经贸合作方面也表现出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在一些世界大国以及中亚国家引起了各种反响。

关键词: 中亚五国; 经济存在; 风险管理; 政策协调; 地区整合; 文化推广

作者简介: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俄罗斯中亚社会政治发展、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等研究。

7.刘丰:《单极结构下的体系效应与国家行为——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载《太平洋学报》2011 年第 7 期。

内容摘要: 尽管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已存在 20 年之久, 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特殊国际结构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考察了单极结构的基本含义与特征、单极结构在体系层面的基本性质, 以及这种结构在单元层面造成的影响, 尤其关注单极体系的稳定性及在这种结构下主要国家的行为倾向。进而根据现实主义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论述, 对目前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的基本方向进行了预测。本文认为, 单极体系正处于弱化过程中, 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削弱这一结构的基本因素, 单极体系下中国外交战略应作出相应的选择。

关键词: 单极结构; 体系效应; 大国行为; 中国战略

作者简介: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冷战后大国关系、国际安全等研究。

(江育恒 供稿)

[责任编辑: 陈冲]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博士生论坛

征稿通知

2006 年以来,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分别与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成功举办了六届博士生论坛。历届博士生论坛主题分别为“国际关系理论: 前沿与热点”、“评价国际关系理论: 积累与进步”、“国际合作理论及争鸣”、“国际关系研究: 探索与创新”、“国际关系研究: 新领域与新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 借鉴与创新”。前五届博士生论坛论文集已经分别集结成册, 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论坛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举办博士生论坛的目的有三: 第一, 搭建博士生学术交流的平台, 在交流中砥砺学问, 激活思想, 启迪智慧, 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第二, 开拓校际师生交流的渠道, 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点评, 促进师生平等交流, 撞击思想火花, 催生学术灵感, 提高学术水平; 第三, 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理和方法论研究, 拓展学术视野, 探索学术前沿, 激励学术创新。

为了继续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促进青年学子与国际关系界专家的交流互动,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拟于 2012 年 8 月中下旬在北京举行第七届博士生论坛。刚刚授予国家级国际关系重点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将作为主要筹办方承办这届论坛。

欢迎全国各地在校博士生积极参与, 踊跃投稿!

现将论坛征文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开放主题

二、时间: 2012 年 8 月中下旬

地点: 外交学院

三、对象: 全国高等院校及科研所在读博士生 (不含 2012 年即将毕业的博士生)。

四、征文与参会要求:

1. 本届论坛开放主题, 提交的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原创性, 字数以 10000 字左右为宜, 论坛不接收已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论文。
2. 为加强学术规范, 行文请参照《外交评论》注释体例, (可从“中国国关在线”网站下载注释体例, 不符合本论坛要求的论文不能入选)。
3. 请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前将论文发送至论坛联系人的电子信箱。

联系人: 马妍 联系电话: 010-68323903 邮件地址: mayan@cfau.edu.cn



4. 提交论文由专家进行双向匿名评审, 入选论文作者将受邀到北京外交学院参加论坛活动, 食宿、往返交通费 (限火车硬卧) 由会议主办方承担。
5. 提交的学术论文在会后经修改将汇编成册; 论文作者将获赠出版论文集; 论文集主题将依提交的高质量论文选题而定。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外交学院
2011 年 11 月 15 日

..... 更正与致歉

刊载于《新视界》2011 年夏季号 (总第 7 期) 第 73-75 页 “2011 级迎新特辑” 中的《“四年一觉南开梦, 希望梦中有美景”》一文作者应对于洪宇 (女,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07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2011 年 9 月保送就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双学位专业硕士)。

经本刊编辑部核实, 该文责任编辑在约稿过程中未细致核对来稿邮件信息, 以致原文误用另一被约稿者张芳的个人信息和照片。本刊编辑部特此更正, 并向两位及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同时感谢作者的及时指正, 也欢迎广大读者对本刊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视界》编辑部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读编往来

我想对你说

《新视界》，你好，我想对你说：首先，在做系刊这一点，我认为很多系都应该向国关的同学学习。因为做系刊不仅锻炼了能力，提高了学术水平，丰富了业余生活，而且加强了同学之间的凝聚力。其次，对《新视界》本身，我比较喜欢的栏目是“学人访谈”、“国关人物”、“青梅煮酒”以及“新书架”几个栏目。我认为这些栏目是作为非国关专业的同学同样会感兴趣的内容，尤其是“学人访谈”和“青梅煮酒”。学人访谈中，老师对一些问题独到的看法和对同学们中肯的建议，我认为对所有学生都是适用的。我也建议编辑能够对“学人访谈”进行一下预告，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另外，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第4期的一个年终盘点栏目，我觉得那个栏目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吸引读者眼球，但是后来却没有再看到过。而觉得比较枯燥的是“学术论文”与“书山有路”两个栏目。因为我们如果要看一些论文性质的文章，基本上都会直接去期刊网上搜索，而不会看这里的文章。最后，我想说，我所看过的《新视界》都是从BBS上下载的，我们宿舍并没有收到过《新视界》编辑部发放的纸质版，所以希望《新视界》发放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祝《新视界》越办越好哈！

——王朦（08级政行本）

一些小建议

编辑部，你们好，我想说《新视界》真的很不错。从大一新生的角度来说，专业和深入是对这本杂志的第一感觉，无论是学术

小编：首先，感谢您对《新视界》的肯定和关注。您提出的希望对“学人访谈”栏目进行预告的建议，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但在工作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需要对部分栏目进行一定的调整，为了保持工作的灵活性，也为了给读者留下一份期待，我们暂时还不会对某些栏目进行预告。我们每期都有封面推荐栏目，读者可以据此明了地知晓该期刊物的重点推介，从而方便大家阅读、批评；至于年终盘点的栏目，因为是年终盘点，所以只有在每年的最后一期才有，并不是每期都有；而“学术论文”和“书山有路”两个栏目，因为我们杂志的定位是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所以正是这两个栏目更多地体现了我们的学术性。我们刊发的学术论文大多是身边的同龄人所写，相较于期刊网中的论文与我们的学习更贴近也更亲切，同时便于我们与作者交流，帮助作者进一步完善，为作者走向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提供助力。我们所刊发的书评的对象也是以较新出版的英文书籍为主，有助于培养读者的国际视野，了解国关新近的研究动态或成果。最后，我们将会适当增加印刷数量，并尽量扩大发放范围，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同学接触到《新视界》，关注《新视界》。

论文专题还是新书架等板块，都对初入大学的我们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且《新视界》的文章都与时政紧密相连，让我们可以更好



地把握时事政治，了解国家大事。同时，这本杂志又与“毕业”、“大四”等字眼挂钩，让我们这些新生在进入大学一开始就有了一种紧迫感，也对我们提前规划自己的人生有很好的提醒作用。但是我觉得《新视界》如果真的想扩大其影响范围的话，宜不单单从国际政治专业的角度来进行编辑，社会学、行政管理等领域我觉得也应该涉及。而这无疑就会加大编辑难度，以及可能对文章的深度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我认为还可以介绍一些出国留学的资料和信息，比如介绍一些知名国外大学，这样对一些想出国的同学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吧。另，要是新视界是彩刊的话就更好了哦……

迷茫中

《新视界》你好，我的问题首先是，咱们期刊能不能给国政的同学们多发几本，最好能做到一人一本。很多同学对自己系的刊物都特别感兴趣。还有就是希望系刊能多组织几次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和我们交流，我们对未来和学业还都有些迷茫，希望能得到更多学长学姐们的指点。

——孙跃（11级国关本）

小编：小跃，你好。感谢大家对系刊的关注。首先，我们的系刊还在起步阶段，在院系的大力支持下，得以使同学们免费领取。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一人一本，再乘以大一到大研二六个年级，每级六个专业，那数量就太多了，在财力上会对学院及系里造成一定的负担。现在希望同学们能先以宿舍为单位领取阅读，如果日后时机成熟，我们会考虑尽量满足每一位读者。另外，据我们了解，很

——王何欣（11级政行本）

小编：《新视界》现在的印刷质量可能还会让一些读者有所失望。因为我们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加上物质条件还不够充裕，所以彩刊对现阶段来说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已经努力改进纸质和图片的清晰度了。关于出国留学的资料和信息，我们接下来打算做一个关于出国留学的专题，即邀请政府学院出国交换以及读研读博的同学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申请经历和感受，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关注我们明年的期刊。至于扩大《新视界》涉及的专业领域，我们还在探索之中，这个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和丰富。

多前辈之前都提到过，特别希望能和弟弟妹妹们多交流。这是个薪火相传的过程，只要能利于师弟师妹们的成长，学长学姐们都会无私奉献的，也希望学弟学妹有问题多和学长学姐主动沟通，我们相信双方都会有巨大的收获。谢谢。

给我们写信吧！

把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发给我们吧！来信请发：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回答你的提问。

[整理：孙迪 张晓康 郝丽君]

[责任编辑：李文婷]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年12月14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 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第 165-176 页。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 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 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 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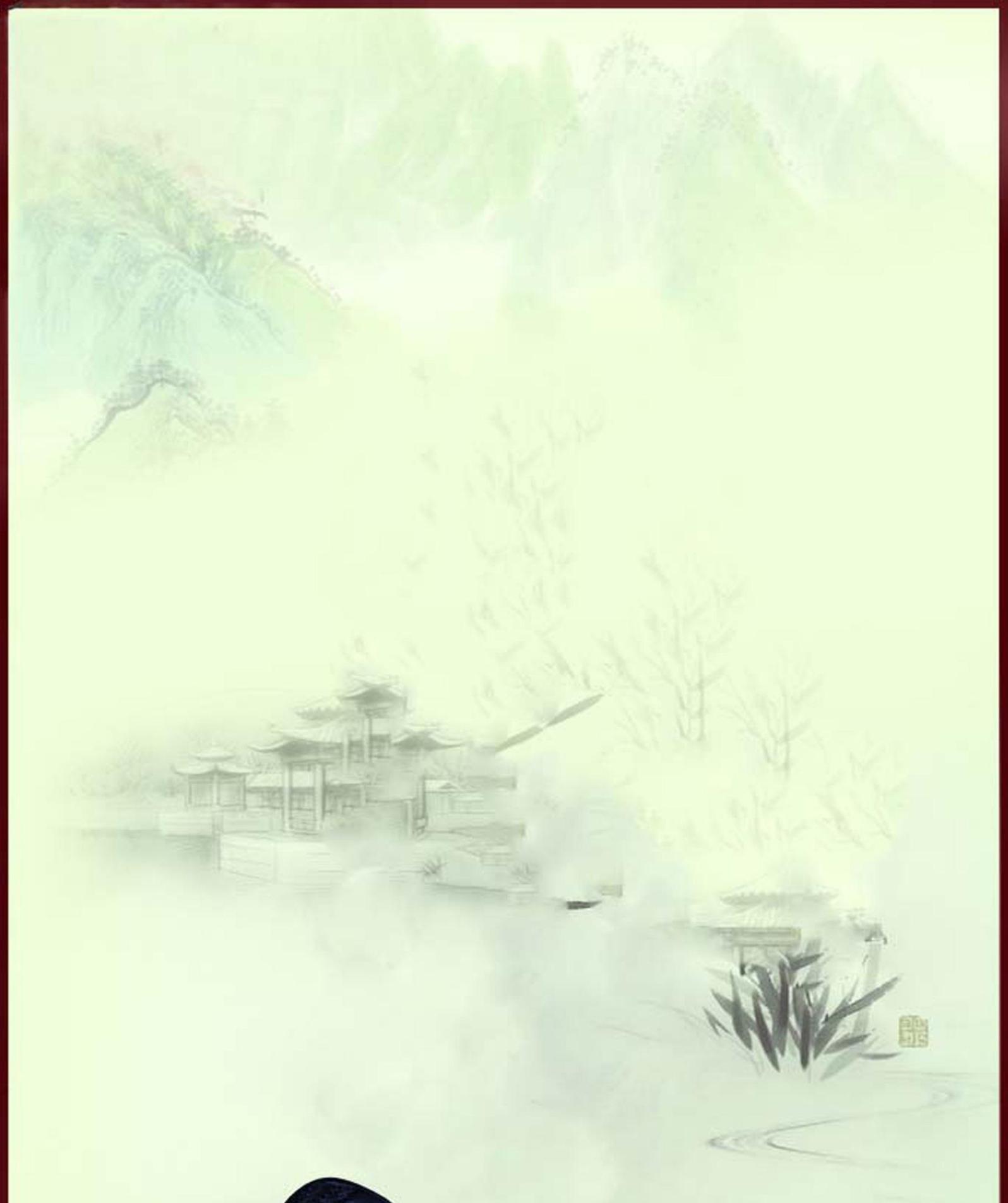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请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